

M5  
C53  
72



3 1799 1909 1

## 本輯介紹

首先要介紹的是莊師宗先生的略論「新民族哲學」，這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近來很有一些人在高唱建立「民族哲學」或「民族文化」，正如作者所說，這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但某一些提倡的人，却撇開了實際問題，退到「性心」的牛角尖上去。他們嚮往於伊尹周公以至孔孟曾左，充分反映了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思想。他們的所謂「新民族哲學」，實際上就是法西主義的哲學。自然，提倡者不僅唱唱而已，他們還想借這些理論來控制別人的思想自由。這是當前一個嚴重的問題，莊師宗先生此篇文章，嚴正而又深刻，對那些倒退的理論，給予了一個具體的回答。在說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發展及其特質一點上，作者的意見也很為清鮮。希望讀者仔細研讀一遍。

關於魯迅的事情，敘述魯迅先生早年的生活，非常細緻有趣。華生先生是當今最深知魯迅先

生思想生活的一人，所以本文的敘述，可以幫助我們對魯迅先生的認識。

德國的內幕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單闕目錄上的細目，就可曉得牠的內容的豐富。作者是最近親往德國作實地調查的，本文是他以生命與自由換來的東西，因此不唯真實，而且寶貴。

最後，超然先生列傳本輯仍然連登，不再贅述。現在已是初秋，是一個最宜於讀書與思索的季節，願讀者們努力。

編者，八，十二。

## 略論『新民族哲學』

莊師宗

### 一，什麼是民族哲學

近來很有一些人，高唱着建立『民族哲學』或『民族文化』而且漸漸要確立一個體系起來，這是可喜的現象。在一向以槍桿統治筆桿的中國社會裏，也知道了文化思想底建國的重要性，那決不是偶然的。然而，我們應該防止的：却是藉此來控制別人思想自由的無聊把戲。蕭一山先生說：『瑪志尼的義大利之使命，費希特的告德意志國民書，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把頹廢的德義人從紛亂衰弱中喚醒起來，建設統一的新國家，一直到現在，還都受他們思想的支配。』這說來，我們中國是否也想藉『民族哲學』或『民族文化』的建立，而求得一個德義法西斯的前途呢？自然，蕭先生大概主觀上未必這樣想，但我們還得提防它客觀上會得到的效果。

『民族哲學』或『民族文化』在今日被提出來，而且想建立個體系，我以為不外有兩種客觀的原因。其一是，由於中國抗戰的偉大目標，必須廣泛地動員全國人民大眾直接起來參加鬥爭。因之，首先必須發揮全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民族哲學是作為培植這種自尊心和自信心而建立起來的。在這一意義上說，那麼，所謂民族哲學不過是具有中國的特殊形式的，然而

却必須是以中國民族革命之國際內容爲其依歸的一種哲學。這就是說，民族哲學是中國式的爲推進中國現階段民族解放的一種哲學。在這裏首先要確定的是中國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實際任務是什麼？而不是舊傳統的全般保留或全般發揚的問題。其二，有一部份人，看到了三年抗戰以來，中國人民大眾的民族觀念逐漸抬頭了；然而，由於民族觀念的抬頭，階級覺醒也促進了。這本是中國歷史的「宿命」：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是密接不離的，但階級間的矛盾却依然存在。而這一部分人，對於人民大眾的階級覺醒是看作爲自身階級利益的威脅的。因之，利用這一種人民大眾抬頭起來的民族觀念，建立一種爲少數人階級服務的所謂「民族哲學」。所以在建立「民族哲學」的另一面，也就是取締「紛歧複雜的思想」。什麼是他們的所謂「紛歧複雜的思想」呢？這倒不是指「民族失敗主義」的思想，這是指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表現出大眾爲本身利益的民主要求的一種思想。而這種民主要求，實際上却並不是分散抗戰力量，而是增強抗戰力量的。例如「民主政治」「統一戰線」和「論持久戰」「論新階段」之類，一般人認爲是救中國的正當要求和正確理論，但那些人却以秘密的指令，限制人民大眾的討論和研究。而在公開的場合，則提出所謂建立「民族哲學」來了。

我們對於前一種的提倡也表示很大的敬意，對於後者實在還表示厭惡。所以我們很同意於天放先生對於建立「民族哲學」問題中所說的意見。

「當前的問題，不是建立不建立什麼『新的民族哲學』的問題，而是怎樣把『從人類歷史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法則和原理』，急速應用到中國當前的現實中來的問題。換言之，也就是『哲學中國化現實化』問題。哲學如果不成為『現實化的』東西，那便是空洞的觀念的無用的東西，如果不能『中國化』，那這一最高的科學原理，便不能和我們民族一向心理習慣相融合，而成爲大家容易瞭解容易接收的東西，同時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也不能爲科學的哲學所吸取，必致和其他一切陳腐的糟粕一樣，永遠得不到基礎和說明。但是這種優秀的傳統的接收，並不是表示新舊的不同，只是由於時代的分野，而是說明舊有的東西只有在更高的理論的吸收之下才能成爲積極有用之物。……」（註一）

所以在今天，如其說要建立所謂『新民族哲學』，那麼我們的眼光應該注意如下的幾點：

- 第一，是中國哲學之優秀傳統的批判地加工改造的問題。
- 第二，是世界最高的哲學原理的融化地接受的問題。
- 第三，是新哲學之民族形式的建立的問題。

第四，是在民族革命戰爭實踐中把新的生活經驗予以理論化，抽象成爲一般原則，再來作爲建設新社會的指導原理的問題。

如其有人撇開以上的這些實際問題，而來空談什麼建立『新民族哲學』或企圖『僵屍還魂』，

還談什麼「性心」之學，那不但一無是處，而且於中國革命，是斷然有害的，我們也要斷然的予以排擊。

但也有人以為各民族自有它獨立體系的哲學和文化，『民族哲學』主要是民族內容的問題，而不是民族形式的問題。他們還可舉出例來：海洋國家的英國哲學，主要是以經驗論為特色的，而大陸國家德意志的哲學，主要則是以理性論為其特色。而且，他們還設定民族哲學或文化產生的原因。這裏，有一位夢瘋狂先生，在中美日報保壘上發表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民族思想的演變，其間就有這樣的話：

『思想的構成，可以分三個成因：第一是民族血統的傳受，第二是社會情形的薰陶，地域環境的促使，第三是民族先天的氣質。如果我們要研究中國民族的思想演變的概況，就不得不注意以上三個要素。在我認為其以地理的環境為最重要。』

但這些實在都是胡說。以英德的哲學用經驗論和理性論作為分界，那祇有像瞿世英這樣的哲學家會說的。這不過是他們祇看到英國哲學中培根的地位，德國哲學中康德的地位。但培根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性質的經驗論和德國的費爾巴哈的哲學有相同之處；而英國休謨的不可知論和康德「物自體」之說，也極其類似。要用國族來分割哲學的界限，是極端愚蠢的事。哲學是人類經濟行為和政治行為的產物，是政治經濟之集中的表現，祇有作為社會之基礎的經濟結構，能決

定各個階段文化思想的性質。而由「人類經濟生活構成的社會組織，雖有各種不同，要之都不過是從較低的物質生產階段走向較高的物質生產階段的具體形態。」（註二）這是新興社會科學的觀點，然而不是真理。哲學不管它有各種各色的體系和表現的方法，但在基本上，是脫不了唯物論和唯心論這一種分野。它是相應於各種社會的性質，和各種社會的發展階段，而用各種不同的體系和表現方法，採取唯物論或唯心論的基本因素而建立起來的。而這各種不同的體系和表現方法，那便是哲學的形式問題。以民族或國家來分這哲學的界限的，就因為我們的哲學史家，在這種體系和表現方法中停步了，或者混亂了，沒有更深入到在這體系和表現方法的後面，那哲學的基本性質上去。那麼襲取法國文學批評家泰納的文學之三種因素（一）民族的血統——種族的，（二）地理環境的，（三）時代契機的）的社會學學說的夢瘋狂先生的說法，在此也可不攻自破了。（註三）而所謂『民族的先天的氣質』和『民族血統的傳受』，我們在這之間，也探究不出有什麼不同的意義。我們的論客，是常常愛用『血統』這一個名詞來增加人民的『民族』觀念的，但是希特拉國社會主義的哲學，正是襲取這人種學說來武裝自己，而今天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爆發，希特拉是巧妙地以人種學說欺騙德國人民大眾，來保障其金融巨頭的利益之發展的結果。在這一意義上來建立所謂『新民族哲學』，那不過要在中國建立一種法西主義的哲學而已。然而這畢竟是一個瘋狂『夢』，中國民族之歷史的社會的條件，不可能建立這一種哲學。而在二十世紀

四十年代的今天的中國民族革命戰爭之中，更沒有可能建立這一種哲學。這不過是地主買辦階級殘餘意識的迴光返照。決不爲中國人民大眾所歡迎。而我們所要創造和建立的，乃是具有民族形式的新文化和新哲學，乃是作爲世界最前進的社會主義的哲學和文化之一部分的大眾哲學。

## 二、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發展及其特質

關於中國哲學或文化的分期（發展階段）及其特質，我們今天還沒有人作過較爲有系統的而且正確的闡明。像筆者這樣的一個文化學徒，自然無法來作這樣大胆的嘗試。但我們「瘋狂·夢」（照外國人名寫法）先生，却給它分爲六期。雖然他是以民族血統和地理環境等爲文化產生的因素，但他在這分析裏，實在很少觸到。自然於各期的「經濟行爲政治行爲」，更不在注意之列了。但一看到他說到墨家的思想與儒家「均同出於一源」「法家的人生觀大多承自道家」云云，我們是益發不敢領教了。我們不知道孟子距楊墨，韓非李斯學於荀子這些事實是作怎樣解釋的？瘋狂·夢先生真有他特出的見解。但我們還請讀者注意這樣的文句。

『第三個時期——戰國的末年思想發展極盛的時期，到了秦漢統一以後，便有齊衰的趨向了，這好像合於「天道周星，物極必反」的通則·絀地。秦的時期極短促，加諸秦始皇又竭力禁錮民智，故思想方面一點也沒有什麼表現。西漢初年，以前各派分子均尚在活動，但



是多平庸之流，找不出一個傑出的人才來。儒家的董其昌等多屬守舊的迂儒，無多大能為。道家也拋棄了他們原始思想，只講靜修養等淺薄的意思。當時儒道二派的末流，却都吸收當時流行的方士妖妄之說，與陰陽家末流相接合，產生了織緯的思想，即所謂道教。陰陽家更加墮落而成方士，他們完全失去了創始者的本意；這些方士到了秦漢以後，逐漸吸收社會上的多神思想，蔚成大宗。後來中國的道教便是多神的總匯。這是值得注意的。法家在西漢一代最見實用，但結果毗於事功而忽略理論，因此思想方面就沒有什麼大的建樹。墨家本就不重理論，秦漢以後更因與當時的專制的潮流不合，故在表面上似乎是匿跡了，但是西漢時的任俠像郭解，王猛等多帶有墨家思想の意味，不過終於因為不重理論的緣故，漸漸數典忘祖不知道他們的思想所自了，這也是很可惜的。綜上觀來，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西漢時是各派思想日趨衰敗的時代；到了東漢各派遂次第滅亡。東漢在表面上是尊崇儒家，似乎思想界為一派所壟斷，實則當時只有經師而無儒者，僅有訓話而無發明，均不能稱為思想家。思想界墮落如此，無怪乎一到魏晉之際，要發大的反動了。」

這是什麼樣的中國民族思想的演變史？西漢竟有一個儒家的董其昌？說是董仲舒的筆誤吧，那麼董仲舒的陰陽織緯之說，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是敘述得很明白的；而這裏却說是「守舊的迂儒」，這顯然不是筆誤。但更奇怪的西漢却還有個王猛，居然又是墨家；大概又是他曾經

「捫虱而談天下事」吧。實在「墨家」得很。像那樣的「瘋狂·夢」者，竟要談建立民族文化，那沒有不變爲「糟糕文化」的。關於中國文化思想的演變，據我們的意見，周秦以後鴉片戰爭以前，本質上沒有什麼更變。是封建文化。但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有不同的形態。在春秋戰國之際，中國封建貴族領主的莊園經濟組織，開始崩潰，私人地主經濟抬頭，於是百家羣起。其間有代表貴族領主的衰退期的思想的莊老，有代表農奴之平民主義思想的墨家，代表新興地主之社會論理道德的建立和社會秩序之建立的儒家和法家。但自秦漢以後而至六朝，中國新興地主從鞏固，興盛而至衰落，儒家與法家的思想就成爲正統。莊老思想之在魏晉之際盛行，正是沒落的貴族地主的哀鳴。這是第一期。隋唐以後，由於戰爭的掠奪，土地關係有了轉化，又因蠻族的侵入，佛教思想也隨之而侵入；唐以後的地主階級，依附於各種不同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勢力，大體有所謂貴族地主，世俗地主（依附於官僚士紳勢力上的），僧侶地主這三雄爭長之勢。這時的思想主要是儒與佛之爭，韓愈的反對佛教，骨子裏不過是世俗地主反對僧侶地主勢力的擴張，而惟恐僧侶地主的勢力與貴族地主相結合。所以他又要重振儒家思想，企圖作爲社會指導原理。但實際上在對於農民的壓迫上，則又相互爲用。唐時所遺留下的「變文」，本來是從佛曲變化出來的一種佛教思想的宣傳文學，但因爲世俗地主和僧侶地主之對農民壓迫的利害相同，在那「變文」上便表現爲忠孝與輪迴諸說相合揉的思想了。可是自唐至宋，雖然中經五代之亂，而這一土地關係却沒有什

麼變化。祇是在唐時本已有了的小土地所有者，因戰爭的土地掠奪，便漸漸在宋時成一個大集團了。王安石的變法，是代表這一集團的利益的。世俗地主的思想代表者司馬光，蘇氏父子等反對這一種革新，而和僧侶地主表示了好感，便是這個原因。可是因王安石的變法，使都市自由商人的勢力增大了，但由中國經濟始終建築在自然經濟上，手工業生產，和行商也幾乎在地主經濟勢力支配下，在南宋前後就有握邸肆特權的獨佔商人——地主出現。這時，對於金元蠻族的侵入，貴族地主與僧侶地主成爲主和派，自由商人，獨佔商人——地主，小土地所有者成爲主戰派；而儒家思想已失却作爲社會指導原理的力量，不得不加以大大的改造了。佛教的思辨法則，就加入在儒家專重人事的經驗論的認識論上去，擴大了儒家的宇宙觀，深化了儒家的抽象思維。朱熹集周程之大成，倡理氣的二元論，實際上是在這一社會發展中所促成的。一到氏族社會的韃靼民族侵入，元朝確立了政權，都市經濟彷彿要成爲地主經濟的對立物而興起了，土耳其意大利商人到中國來貿易，文化上帶來了另一種的色彩，那便是回教思想的抬頭，而儒家思想顯然衰退了。這是第二期。自明興至清的鴉片戰爭爲止，中國社會成爲都市經濟與地主經濟的長期鬥爭時期，但由於生產技術的落後，都市經濟沒有可能促使地主經濟的崩潰，而每一朝代的更易，又成爲地主經濟的鞏固的手段。末期的封建地主的哲學代表王陽明，就提出了絕對的唯心論。建立了『此心即此理』的良知說，和致良知的哲學。但隨着明朝的覆亡，滿清的侵入，由都市經濟的發達，到

達一個可以獨立的階段，反映到意識上來初期的都市布爾喬亞的思想也抬頭了。這開始和世俗地主的儒家思想結合起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就表現了種族革命和民主主義思想的結合。這一思想直接影響了章太炎，終於成爲辛亥革命的一部分思想的導源。所謂清初的樸學家可以說又把宋之理學，明之心學作了一番改造，在回返漢學，（註四）或者說回返到初期的儒家哲學的口號下，表現了部分都市布爾喬亞的意識。太平天國運動是這一思想向更高階段發展，而曾國藩則爲反動的官僚地主的思想之最無恥的一面的表現。但這以後，中國就入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結束了第三期的思想，而入於第四期了。這之後直到現在，是封建地主思想，買辦思想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長期鬥爭；而民主主義的思想又以五四爲界限，從作爲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階段發展到向社會主義接近的新民主主義階段。……

但以上的分期，我們也不過略就大體上看來的臆說。雖然不免有誤謬之處，較之夢瘋狂先生，或者穩當一點。但我們必須聲明，這仍然是在封建社會裏，由於土地關係的變化而表現出來的思想樣式（genre）上的不同，可不是基本性質上有什麼大大的改變。而在這分期中所顯示的，是地主階級的思想，所論儒家思想，從初期的經驗論的哲學，到宋時的二元論，再到明時的主觀唯心論，不但表現出根本上已經漸漸僵化，而至於不得不沒落。而且實質上，是帶有更反動的性質了。它的反動性主要是表現在：以心性抽象的定則，代替了現實的認識，藉此以加強其對反對

勢力之控制。所以不論我們如何提倡會國藩，再上訴到王陽明，全都是不合時代的，全都是反歷史潮流的意識。如果用民族哲學和民族文化的口號，來掩蔽思想之復古和倒退的作用，那麼歷史自身就會否定它。這是無疑的。

這裏我們進而來探討蕭一山先生的建立民族哲學的理論。

關於蕭先生的理論，天放先生已經作了兩次批評。（註五）我們表示完全同意，這裏不再重複。這裏，首先我們應特別指出的，在所謂並非「紛岐複雜的思想」的「正規派」（不是正統派）的思想陣營裏，顯然有兩個小派別。（我不知道這是否也是依附於政治上的兩個小派別。）其一，是以張君勱為首的大信其宋明理義之學的「民族文化派」（註六）其二，是以蕭一山先生為中堅的有肇承清代樸學精神的傾向的「民族哲學派」。蕭先生是反對宋明理學的。其言有云：

『（一）文化方面，文化方面牽涉的範圍很廣，我現在只能以學術為代表。學術本來在社會上佔最高地位，所以一切都歸它指導，成們上古的政教合一，「有官學無私學」，固不用說了。孔子教了以「大學」「小學」兩義；小學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第一即修身）大學是治國，平天下，（九經後八項曰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亦同此意。）格致修齊原來為的治國平天下，也可以說治國平天下是目的，格致修齊是手段，這道理是一貫的，不是分為兩

截的。換句話說：就是學術自有它的功用，可能與政治社會脫節。秦漢儒者，多少還明瞭這種意思，雖然他們「求善處大事，理任大事，」「持寵固位，終身不厭，」（見荀子仲尼篇）遂不惜迎合帝王的好惡，而「崇美隱敗，」（見前）用「威刑劫制」和「方士雜糅，怪迂苟合。」（見夏曾佑古代史）如李斯董仲舒秦漢博士諸生之流，但他們要「得君行道，」也還不外乎孔子「如有用我」「見諸行事」的精神。所以西漢的今文學家，雖然是「抱殘守闕」，却還講「微言大義」，用經術以為治術。即如王莽之鹵莽，劉歆之作偽，也還是孔子「托古改制」的精神。不料哀平之際，古書繁興，解經為史，從此六藝為教化之源，和政治完全分開了。其下焉者，不墨守章句訓詁，就附會鬼神術數，於是乎格物致知為學者畢生之事，而「經世致用」之學湮沒了。魏晉以後，節談清淨，頗受道家的影響；唐宋以來，好論心性，又承禪宗的唾餘，於是正心誠意修身居靜為學者畢生之能事，而與孔孟體用之學完全分離了。顏習齋先生批評得最好：

「試觀兩宋及今，五百年學人，尚行禹益孔顏之實事否？徒空言相續，紙上加紙，而靜坐語錄中有學，小學大學中無學矣，書卷兩廡中有儒，而小學大學中無儒矣；」（習齋記餘大學辨業序）

「周孔以六藝教人，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閉心靜敬，著述書

史，皆入於禪而不悟，自覺其無益於並而不悟。」（存學卷二）

「諸儒之論在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未墜集序）

「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讀書之禍，讀書者自受其禍，而世之名大儒者，讀盡天下書，歷代君相方且以爵祿誘天下於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聖大賢不得破矣！」（言行錄卷上）

顏先生的學說還多，我們也不便詳引，就此已可知其批評漢宋儒者以讀書言性爲學，則與周孔之道，「相隔萬里」了。然而我們一二千年來的學者，除掉解經說理的以外，又有幾個像顏習齋呢？無怪乎「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段報君王，卽爲上品矣」！誠然學術的根基，要從讀書明理修身做起，但是說讀書明理修身就算盡到學術的能事，那不是第於「買櫝還珠」麼？顏先生說：「書之文字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又說：「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可謂學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譜果琴乎」？我們也可以說：學術就像琴譜，治平之業，才是陽春白雪的琴音呢！少數人只研究琴譜，未嘗不可以，但也不要忘記了琴譜爲的是彈琴，如果人人都習琴譜，而不管彈琴，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麼？固然，專治學術而不必或不能問政治的人也應該有，但總不要以爲學術自學術，政治自政治才好。因爲學術不是爲的個人享受，却是爲的社會享受。我們二千年來

的儒者，把學術變爲個人的「娛樂品」，「敲門磚」，以爲只要「獨善其身」，「飛黃騰達」就夠了，所以顏習齋先生說：「人才盡矣！聖道亡矣！乾坤隆矣！」降至今日，我們人人都知道，非科學不能救國，然而人人都脫不掉漢宋的傳統根性，所以科學一到了中國，也就書本化空談化了，以總理爲骨幹，以科學爲面孔的「洋八股」，一直欺騙了，也就誤了我們幾十年的光陰。現在我們要「迎頭趕上」，非把「爲學問而治學問」的傳統思想，和以書本空談爲學問的謬誤觀念，加以改正不可！」

這裏很明顯的，蕭先生表示着反對漢儒的故訓和宋儒的理義，而特別強調學術的致用性質。這是蕭先生，也是樸學家的進步的地方；這是中國文化優秀的傳統之一形式或一屬性，值得我繼承的。但我們要繼承樸學家的優秀傳統，我們同樣還須揚棄它內容的缺點。第一，胡適之以爲樸學家是抱歷史主義的。我們認爲那歷史主義，不是進化的或發展的歷史主義，這正如蕭先生在這一節開初所說的，是多少以古代的政治文化爲它前進目標的，但這是倒退，這是復古。蕭先生更明顯的說：

『我國古代的政治思想，本來是積極而有系統的，皇帝王霸之分，大同小康之說，層級顯然，至於具體的政綱，就是春秋公羊傳的張三世。由撥亂以至昇平太平，那個能說它不對呢？況且古代的聖哲，更具有積極人世的精神，以大禹胼手胝足，十三年三過其門而不入，



孔子一車兩馬，歷抵列國之君，栖栖皇皇的如喪家之犬，這種救世救民的偉抱，已饑已溺的仁心，可以爲華世的楷模，循乎此似不難臻於盛治了。』

這種的說法，無疑是時代的倒轉。固然救世精神是好的，但政治理想，所謂大同小康云云，那還是一套胡說。清末最後一個樸學家章太炎先生，在這一點上，實在較蕭先生還進步，大同小康之說，擾亂昇平、太平三世之論，是經今文學家康有爲的托古改制之談。章太炎先生就反對這一種把孔子當作「教主」看待的說法。孔子不過是一個歷史家，教育家，也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但章太炎也並沒有跳出他非歷史的歷史主義，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他也馬上企望一個類似封建政制的中央集權政府，終於爲袁世凱所給，無意地做了他衝鋒號手。（註七）第二，樸學家的興起，我們誰也不能否認它和明末反清復明運動有關，這是他們主張實踐的惟一原因。但他們哲學的唯物論性質，是形而上學的。他們固然解釋致知在格物，是說致知在於「親手習其事」，但他們之事與物的準則是天道。顏習齋說「理氣都是天道，性形都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又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這和王陽明的心學。（從此心即此理，天理即良知，到知與行合一，再到致良知）的說法，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什麼是天道，天理，良知？那就是善的本體。惡是由於引蔽習染爲祟，王陽明也是這樣說。王陽明常常用盜賊作了搶劫，自知錯誤而覺愧惡，以爲是良知之發現，

天理之在人心。但我們知道，強盜的作奸犯科，自知愧惡，是習俗道德使之然，是受統治階級支配思想的影響。以這看爲天理和良知，那就是使統治階級的支配思想絕對化，神聖化的意思。而顏習齋所謂「天道」，也不過地主階級所遺留下來的支配思想的抽象名詞。所以對於樸學家的重實踐的精神，如其不使它轉移向中國目前新民主主義文化政教的建設上來，那結果仍舊不過叫人民大眾爲少數階級加重其服役而已。而我們蕭一山先生對於孔子政教的嚮往，正是這一作用的具體說明。我們必須嚴正的指出，今日講民族革命，決不是湯武革命的意旨；今日講民主共和，也決不是伊周之治的政治理想。凡百以湯武革命，伊周之治來曲解今日的革命和民主共和的，其目的都不過在造成一個皇帝的地位，幾個所謂賢輔佐的官僚的倒退政治。

其次，蕭先生以爲中國政治上大同世界之不能實現，由於道佛思想，混淆了儒家的理想。其言曰：

「爲甚麼大同的理想，在二三千年後尙未能實現，而國家民族反日趨於衰微呢？推考其原，大概是由於秦漢以後道家儒家學說的變質——漢人把道家的無爲無所不爲解釋成清靜柔道，把儒家的中庸達德，大學治平，解釋成修身德化，因此「慎無擾獄市」的賢相，（見曹參世家）對強敵講禮讓的迂儒，（見鹽鐵論）都出來了。這時候古代的政治學雖已有些變質，但「申韓原於道德」，禮樂不廢名實，也還爲學者政治家所理解，所以雖有方士儒家雜

樣的諸生，篤好黃老術的后妃君相，仍能達到文景「幾致刑措」的盛世。一般儒生說：「漢武帝內多愆而外施仁義」，又說「宣帝持刑太深」，然而宣帝却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雜之」。實爲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之名言。及至「元帝仁柔好儒」，「光武以柔道治天下」，於是乎「裝着周孔面貌，運以黃老精神，構成申韓體段」的無爲政治才真正的產生了。從此以後，儒道法三家的精義全亡，而「非儒，非道，非法；亦儒，亦道，亦法」的三位一體「無爲政治」整整推行了一二千年。這種無爲政治，君主當然是很樂意的，因爲「多事不如少事」。（康熙帝引古人語）士大夫階級更爲歡迎，因爲士大夫是上層階級，利在維持現狀，爲政的人不要得罪士大夫就好，所以說：「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除也」。（文彥博對宋神宗語）一般的老老百姓，也樂得彼此相安，因爲百姓的力量太微弱，在土劣貪污的壓迫下，並不希望政府爲他們謀福利，只希望少立一法，少剝削一點。如此政治：「漪歎盛哉」，「皆大歡喜」，因而支持了一二千年。弄得政府設官不知道是幹甚麼的，任聽農民自生自滅，無所謂養，無所謂教，只要他們納錢糧，不反叛就夠了。百姓除了納糧興訟以外，也和政府不發生關係，只要官吏清白一點，少刮一點，不要如「石壕吏」的暴行，「奏銷案」的苛處，也就歌功頌德不置了。如此人民怎不養成「帝力何有於我哉！」的觀念；怎不養成「作誰的百姓不納糧？」的心理，於是乎苟且散漫，缺少前進尚義的精

神。「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種消極的人生哲學，乃為我民族一貫傳統的根性，一切事業怎能不日即廢弛，民族生命怎能不日趨衰弱呢？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若是「有為」的政治家出來想着「百度維新」「振興民族」，勢必引起士大夫階級的反對，老百姓也徒覺紛擾，一時得不到益處，一定失敗無疑了。王安石就是很好的例子。反對王安石最主要的人物司馬光，曾作一首「無為贊」，他寫給王安石的信，又歷述老子無為之言，以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這還不要緊，他所著的「資治通鑑」，是我們民族的「歷史政治學寶典」，家喻戶曉，其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其餘如蘇東坡，韓魏公，程明道，都是大名鼎鼎的文學家，理學家，他們的文字影響於後世也不小，而歸其要則在「無為」。於是國民心理中以「無為」為高尚，以「有為」為多事，這一種傳統的觀念，在一般人的潛意識中，直到現在還未能剷除淨盡？我們只看一般人的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一般百姓對於官吏士兵，並不希望興利除害，希望「不擾民」，就可以知道。但這種思想實在是要不得的。」

其實，蕭先生這看法也是錯了的。中國的「非儒，非道，非法，亦儒，亦道，亦法」的「無為政治」，却是最「有為」不過的。而唐以後佛教思想，却也「輔翼天道」（註八）而出現的。自然，這是站在中國統治階級方面說的。中國的統治階級，歷來是以儒家思想為其社會指導原

理，但一到「社會本身」不受指導的時候，它就拿出「道」與「佛」來。（而法家則歷來與儒家不分。）而有時則三位一體的並用。儒家教導農民，做人要怎樣怎樣，樹立起了倫理道德。法家則拿起了劍，說道，要不這樣，我就殺掉你。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我來吧，道家於是說他們壓迫你，剝削你，你理他作什麼呢，自己吃苦一點算了。於是無爲而治。但還不够，佛家來了輪迴之說，今生苦，是前生沒有修過福，現在能熬得了苦，下世就有福了。於是所有的農民都成了統治者及其幫閒們的祭架上的犧牲。如其蕭先生能更進一步的說：中國民族衰弱的原因，是統治者及其幫閒們將「儒，道，法，佛」的思想結合起來，把中國人民大衆麻痺了，宰割了，吃掉了的結果，那就近於真理了。中國人民之「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是統治階級教出來的。救之之道，祇有先行民主政治。這正如蕭先生所說，主張「無爲」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成爲中國「歷史政治學寶典」，但這也還是統治階級所要的，不是人民大衆所要的。中國「一般老百姓對於官吏士兵，並不希望興利除弊，希望『不擾民』」，這也確是事實。然而蕭先生却沒有看到：老百姓却沒「興利除弊」的希望，直到現在，書店被封，書籍被禁，青年被拘或殺戮，而老百姓在新土劣新官僚的壓迫下，連開口說話的權利也沒有。把民族的衰弱，一歸之道，佛之無爲，再歸之於老百姓沒有「希望」，這是倒果爲因的。蕭先生要真正祛除民族衰弱的原因，首先得要求政府澈底實行民主政治，祇有在實現民主政治過程中，也才能建立中國現階段

所需要的『民族哲學』。

但蕭先生是不作如是想：蕭先生想以定儒家於一尊，來建立它的『民族哲學』，來祛除他所謂『民族衰弱的原因』。可是儒家的哲學，到底是爲誰而建立的呢？我們可以毫不客氣的說，爲中國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爲地主的利益。孔子有入世精神是不錯的，但他分清了階級：治人階級，和治於人階級。而治於人的階級，是食人（供養別人）的階級，治人階級是食於人（吃人血汗）的階級。而前者爲君子（包括地主貴族，官僚）而後者爲小人（農民手工業者小販）這點還不够明白嗎？而孔子之所謂『仁』，那就是說，愛惜治於人階級（故曰仁者愛人）而所謂『義』，那就是說，照規定拿治於人階級的血汗錢，不要過於拿得多。過於拿得多，會弄到沒有可拿的。（故曰義者宜也）。但這還不够，因爲普天之下治於人者畢竟是多數，而治人者畢竟是少數，而多數人之間的和平相處是於少數人爲必要的，故又教之以相互之間的共處的方法『仁』『義』『忠』『恕』等等。這也許就是蕭先生所謂『文化至上』主義的精神吧：重德教化，不主張嚴刑酷法。也就是孟子所謂『王道』——王道文化。然而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却是兄弟，這之前和這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蕭先生畢竟是個歷史家，不是看出這文化至上主義的王道文化的漏洞，而是看出它的秘密來了。於是『主張用『動的』『積極的』人生觀，來代替『靜的』『消極的』人治觀；主張用民族至上主

義來代替文化至上主義；反對「仁柔好儒」「崇尚德教」的無為政出，推崇「名正法備，則聖人可以無事」的法家精神；反對「支離破碎」「靜坐空談」的俗儒之學，提倡「吾儒之學以經無爲宗」的現實主義……（註九）這就是「這之前和之後」跑來的霸道主義，若照現在說法，分明是法西主義的民族哲學。然而，從中國文化史發展上看來，蕭先生的哲學，將成爲五四新文化的反對物而出現。實在要不得，而且是不可能的。

我們很同意天放先生在哲學雜誌第二期上對於新哲學建立的三個要點。這和我們上面提出的四個問題，原則是相同的。我們也同意賈路評民族文化的作者提出中國文化傳統的三種特性（一）現實性，（二）調和持中心，（三）排外性。但這不過是附麗於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基本性質——封建主義文化的一種屬性。而這屬性，有時是作爲文化哲學之發展（運動）的一種形式而表現出來的。我們不是形式主義者，但我們也不過份估低形式的價值，然而我要問的，民族至上主義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即它是首先以人民利益爲前提的民族至上呢，還是少數人用以欺騙多數人的民族至上？「名正法備」的「名」是什麼？「法」是怎樣？還是如若干人之所爲，以禮教思想來代替了三民主義思想的三民主義的「名」呢？還是真正做到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的「名」？是如五五憲法根本上表現大總統獨裁的精神的「法」呢？還是應有更好的更完備的適合民主精神的法？這一切是最要緊的。空洞抽象的語句，「對於我們目前有什麼用

呢，「天放先生這樣的問過，但我們還要比天放先生說得更拙直一點，這些空洞無內容哲學主義的建立，是爲的要把我們充有階級之矛盾統一的內容的民族觀念，引到更抽象的空洞的語句去，而代之以少數階級獨斷專制的內容，還是有他們的用處的。俗諺所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艸」，我們蕭先生的辦法，却正是如此。請看這一事實：是中國統治階級把民族弄得萎靡不振，而蕭先生却又譏罪於老百姓。以蕭先生的歷史智識是不難證明這一點的中國老百姓直到無路可活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來答復給治者的壓迫過。儒家中心主義或儒家一尊主義的民族哲學，讓我們看，蕭先生還是不建立起來好。

### 三、評新民族哲學發凡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看樂斯先生新民族哲學發凡（註十）的哲學體系和內容吧。

樂斯先生的新民族哲學發凡，大致是根據蕭一山先生的文章而寫下的。不同的，却在用語上。樂斯先生以「政治力的表現」代替蕭先生的法治主義。以「全體主義的趨向」代替了蕭先生的「民族至上主義」，但實質上是一樣的。

樂斯先生所謂「動的人生觀」和「動的社會觀」，首先是否定了人類社會裏的階級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之客觀發展的意義，而祇從所謂「個人的意志」上出發的。不錯，樂斯先生是主張人



與人的關係應有「拔刀相助」之誼，（以票票足踢女客爲例）而不應該「坐視無睹」的。他說：

「……所謂「靜」的精神，亦可稱之爲被動的，畏縮的，妥協的，退讓的，消極的，得過且過的，牢守舊規不求長進的心理；所謂「動」的精神，却正與之相反，而是主動的冒險的，執着的，前進的，積極的，不安現狀時時求進步的心理。「天行傳，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這種所謂「動」的精神的註釋；因此這種「動」的精神，也可稱之爲「力行哲學」。「力行的反面，是幻想，是空談，是無所作爲，是躲避責任。及至幻想，空談，沒出息，不負責等習慣形成風氣以後，少數有志氣，有毅力，有作爲的人，反格於環境，不能發揮所長，勇於所事，於是社會漸形衰落，民族毫無生氣就」

這種從一般上說來，是不錯的，但是所謂「動」，却一樣有內容。爲什麼而動？什麼，決定人的意志，也成爲「動」的內容。賣票脚踢女客，正要問問爲什麼踢？踢得對不對？如其僅以爲踢終不合法，歷史上的農民暴動，（如太平天國）中山先生的倡言革滿清的命，何曾合過法。如果僅憑所謂極其靠不住的「良知」或「良心」上出來的「憤慨」，那麼，也無怪曾國藩要撲滅太平天國，而康有爲要反對中山先生了。樂斯先生在這裏以意志來代替了王陽明的「良知」，「意志動呀，那就得動了。」是誰的「意志」？階級的意志是說不得的。那祇好說個人的意志，或人類的意志。

「……人的作爲發動於意志，意志的力量，雖沒有像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所說的那麼簡單，淨意志要看，人就生出雙睛，意志要握，人就生出雙手，然而我們要是寬泛一點來說，現在的飛機，在一定意義之下，確因爲人要想飛而才發明，現在的火車和輪船及其他交通工具，確因爲人想縮短地球的距離而才發明。卽就原始時代有情形來說，原始人的石斧石戟，亦因他們意欲增加自己的力量而發現。人因爲要生活，必須的各種資助生活的方法，於是各種工具發明了；又因爲要有較好的生活，於是較精美較完備的工具發明了，隨之而各種社會組織也成立了，而一般所說的人類文明，也就愈演而愈進步了。要生活是意志，因爲要生活而發明各種工具也是意志，要有較好的生活是意志，因爲要有好的生活發明較精美的工具，與較完密的組織，也是意志。意志發動一切，在原始時代如此，在現代人類文化昌明時代亦如此。

意志的通俗稱呼，就是欲望，就是「我要這個」「我要那個」的欲望。欲望是無限止的東西，今天一個欲望滿足了，暫時間得到快樂，但快樂了若干時候，新的欲望又起了，新的欲望滿足了，再隔若干時候，只有更新的欲望發生了。如是者欲望無窮期，人的追求也無窮期，然而人的年壽究屬有了限數。欲以有限的人壽，追求無窮的欲望，人生將永無快樂的一日，也是勢所必然的實情。有人（例如叔本華）就因這個緣故，認爲人生根本是痛苦的，因

而形成他們的悲觀哲學。我們雖不同意於他們的悲觀論，但於上述意志或欲望的分析，也不能不認為千真萬確，我們將用什麼方法，來解脫這種困難呢？為欲解答這一問題，於是我們的研究，也須轉到「人與人的關係」，即所望人的社會生活方面去了。」

但樂斯先生自己也發生了破綻，「人因為要生活，必須有各種資助生活的方法，於是各種工具發明了。」人的作為發動於意志呢，還是起因於生活。而人類社會的結合，以生活樣式作為它表現的時候，這社會生活就有它自己發展的法則，不是個人的意志所能隨便左右的。章太炎說這是「勢」。他認為有人說袁世凱包藏禍心要做皇帝，那是過慮。他說，袁世凱要做皇帝，首先得有能力打倒外國侵入的力量，然後才能得民心，但現在他「勢」不可能。我們要看這「勢」。「勢」不可能，強「勢」而為，必然倒敗。可惜他祇着重於「勢」，而不注意「個人」，袁世凱終於做皇帝了。然而「勢」不能使他成功，章太炎的見解還是對的。這「勢」就社會客觀發展法則，不是個人意志所能支配的。

但樂斯先生所要轉到「人與人的關係」上的動的社會觀是怎樣的？樂斯先生說了一大套，仍舊不出孔子的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的社會觀。可是從個人主義出發的三不朽社會觀，祇不過將個人事業寄托於社會而使之永存於人間吧了。不錯，這也是很好的一種觀念。但社會的客觀發展是怎樣的？它的具體結構是怎樣的？現存社會的缺點是怎樣的？它應該改造為怎樣一個社

會？這些一切，非有正確的把握不可。否則，也祇有如林語堂之所說「正氣化而賦爲流形，或爲蔣介石之氣象，或爲李宗仁之兵術……」成爲此夢囈還討厭的社會觀了。

那麼再進而談到「政治力的表現」，樂斯先生說：

「在新的民族哲學中，一個理想的政府，是有計劃，又能把計劃施諸實行的政府。不是一個吃飯不管事的政府，而是一個有作爲，肯苦幹硬幹實幹的政府。不是一個蕭規曹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政府，而是一個蓄意改良，埋頭前進的政府。不是一個空談清議，遇事諉過卸責的政府，而是一個人飢已飢，人溺已溺，引天下爲己任的政府。不是一個中途妥協的政府。不是一個無爲而無不爲的政府，而是一於知不可爲而爲之的政府。我們應當明白，政府處理政事，正像個人處理私人一樣，要隨時隨地，圖謀改良，期求長進。不僅要有計劃，而且能够實行計劃，貫徹計劃。政府在貫徹其計劃的時候，倘有不肖敗類，從中破壞，從中阻撓，就當用極大決心，雖至犧牲這些敗類，亦在所不惜。因爲清除了敗類，消滅了阻撓，就可把整個的事業完成，而福於人民大眾。」

這些話，我們認爲表面上說來也是不錯的，但也很顯然，這是一種「好人政府」的主張，這不過是「人溺已溺，人飢已飢」行仁政的政府，治人者階級和治於人者階級是分得很開的。但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首先是人民有政治權利，不是政府要爲人民怎麼做，才去做；而是人民命令

政府要這麼做就得這麼做。如照前者立場出發，是不可能做到所謂「仁政」的。二千餘年的專制餘毒，我們的教訓受得够了。而現在却必須倒過來，取後者的辦法。如照前者辦法，那麼由於傳統的社會勢力，統治者大多會是上層少數階級出身的。於是再在政府等於國家的等號下，所謂「國族至上主義」是什麼東西，也就可以明白的了。樂斯先生說：

『在新的民族哲學的條例中，國家和個人的地位之並不是對等的，國家的利益處於主位，個人只在不違反國家利益的條件下，方始有私人利益之可言，所謂「國族至上，意即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高過個人，個人有為國族犧牲的責任，國族沒有遷就個人的義務，個人不僅在道義上，應當聽命國族，而且在論理上，亦當依附國族，因為個人離開國族，不獨暫時利益，得不到保障，即連整個的生存，亦因得不到適當的歸宿，而失去意義，這點，我們在分析新民族哲學下各人應有的人生觀時，已有過充分的說明了。』

然而，樂斯先生呀！這樣單純的觀點是不對的。國家和個人的地位，原不是對等的，但必須是統一的。國家是靠各階級的個人而結合的，沒有個人，還有什麼國家？在形式上，國家的地位是高於個人（各階級集團的成員），然而各階級集團的成員之集合意志——統一意見，（民主集中的意見）却必須是支配國家行政才行的。那又可說，個人（階級集團的成員）高於國家。這就是個人與國家之統一。而國家的利益，要不是以人民不大衆的利益為前提，那國家利益，又將寄

托在誰某的身上呢？個人固然不能離開國家，但人，却都他所屬的階級集團，把個人從階級集團中抽取出去成爲完全的個人的時候，於是再用國家的大帽子一壓，個人自然祇有壓了個扁。我們決不是個人主義者，也決不反對今天民族解放的偉大任務；但我們却是把民族解放的目的，放在人民大眾的利益的取爭這一點上的。不是爲了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的「國家」而「至上主義」，而是爲了結合這國族的實際內容——人民大眾，而「至上主義」的。政府還得把政權交給人民，政府還得聽人民的話做事，抗戰以至於建設。要不然，這樣的民族哲學建立下去，那要人民去參加戰爭，那麼如拴牛拴羊一樣的抽壯丁的辦法，還會繼續下去；那假糧食統制之名而不事先採辦的，如甯波一帶，人造飢荒的事，也會繼續下去；官吏之枉法舞弊，二十天內出口了三百七十萬法幣（甯波海關的統計，較之去年一年出口數爲多）的害國行爲也將不可戰止；假名「軍事第一」，武裝斷絕交通，不許關員檢驗，由已庇私運（也在甯波）的事，怕也不會斷絕吧。

那麼什麼是樂斯先生新民族哲學中的全體主義呢？還是看他的原文：

「全體主義者不承認個人本身，即是一個實體，能够脫離社會，獨立自主，獨立自存。社會不是個人的機械的集合體，並非所有的個人，堆積在一塊，就組成了社會。除了許多個人堆積在一塊的條件之外，還須加上另一種因素，方始成爲社會。這另一種因素，就是精神的共體八個中情形，正像有機體由細胞組織而成，但諸多細胞結合攏來，並不就成爲有機

體；必須於諸多細胞相互結合的條件之外，再加上另一種因素，方始有機體的特性，得充分展露。這另一種因素，就是所謂生命。精神的共體在社會中所據的地位，正像生命在有機體中所據的地位。個人與社會的精神共體，發生關係，取得聯絡，方始完成其自身，並建樹其人格。在這個意義之下，可知並非個人是主，社會是附，反之，倒是社會是主，個人是附。

全體主義者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自然看重社會（國族），更甚於個人。我們在前面說道，個人必須在社會中，取得一個歸宿，（心知的或事業的歸宿），現在更可明白，個人不僅必須以社會為歸宿，而且必須從社會方面，取得淵源。社會（國族）高於個人的學理，現在賞益可明瞭了。

把這個學理，應用到實際的經濟問題上去，所有個人的經濟利益應當全部奉獻給國族，而由政府作整個的企劃與調整。而且在實際上，也只有這樣做法，方始個人對於質的利用與對於自然環境的裁服，更能收獲實效。』

這裏關於個人和社會的結合，我們已在上面表示了意見，但有趣的，倒是精神共體的結合原理。我們知道所謂民族，是具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共同依歸的經濟利益，共同的歷史傳統，和生活風習的結合體。如其以這為「精神共體」呢，那自然可以承認。然而以這樣解釋的「精神共體」為前提，那不但要看出它統一的一面，還要看出這矛盾的一面：語言文字之並不能普遍享受

和運用，共同依歸於民族利益下階級利益之矛盾，共同的歷史傳統之前進的與落後的分野，生活享受之不平等的現象，這都不能熟視無睹的。那麼說來，社會（國族）本身還是個矛盾的統一。而社會（國族）之發展，也是這矛盾的發展。但樂斯先生是以精神共體擬之於生命的。何明生在哲學雜誌第二期略論生命中，以非常精密的科學觀點，而指出這生命不過是生活現象。是生活的物質同化和異化的矛盾的統一過程。這正如我們上面所指出社會（國族）的「精神共體」如其這名詞姑且可以用的話）却是階級之矛盾統一過程，是站在同一原理上的。所以，我們的新哲學，決不是這種依附於封建主義上的全體主義，（Totalism）而應是依據社會主義法則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我們以上所說，其實都是一種極平凡的見解。我們所需要的哲學，是作為社會主義哲學之一部分而適合於目前中國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的大眾哲學。但我們的方法論，却是唯物論辯證法的，我們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的。我們的社會觀，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我們將如何運用民族形式，在廣大的人民大眾中建立起新的哲學，新的人生觀，那怕也祇有把中國的「個別形態」導入於國際的「一般形態」的關聯中，再「根據中國的客觀條件和現實要求，把哲學的一般形態轉化為活生生的個別形態」。這「也就是如何接受世界進步的哲學思想並把它轉化為中國東西的問題」。（註七）



但今日建立新民族哲學者的心事，却在樂斯的篇末表現得非常明顯：

『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我向前，你們跟着我；我退後，你們槍斃我；我死了，你們給我報仇」。新民族哲學所當致意的，就是這一種民族精神的栽培。』

這個「我」是誰？是個人英雄獨斷主義的象徵！是少數統治階級的象徵！我們的民族革命事業，不是跟着誰跑的事業。也不能等這人退後了，才去槍斃他，這人死了替他報仇的事業。而是廣大的人民大眾自主地來參加，按照自己應於一定的歷史社會的發展而獲得的集合意志而推進的事業。領袖是祇有在作為人民大眾的意志之集中表現的時候，他才能領導偉大的民族解放事業。一逸出這限度——這人民大眾的集合意志，那領袖的雄姿將會在另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祇有羣衆造的領袖，沒有自我支配羣衆的領袖。固然人也可以利用傳統的地位，抓住羣衆的弱點，造成自己領袖的地位，如希特拉之所爲。但帝國主義者的前途，是可以估計得到的。我們可乾脆回答樂斯先生，我們不要這種盲從的民族精神的栽培！今日的抗戰，正是我們人民大眾從血的鬥爭中獲的；我們要服從的是自己的理性。這理性，是結合在人類最高理性裏的。

四〇，八，三日

（註一）見讀書生活社出版的哲學雜誌第一期。這是一篇有很好的理論基礎的文字。

（註二）同上

(註三)關於泰納學說之錯誤，可看開明版從社會見地來看藝術居友的作品，和樊仲雲譯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註四)這是胡適之的說法。

(註五)均見於哲學雜誌

(註六)關於這，可看上海周報無咎作，略評民族文化一文。

(註七)見本叢書第一冊戀愛新論也談關於章太炎一文。

(註八)柳宗元語。

(註九)很抱歉，我們無法看到蕭先生再論建立民族哲學的原文，這裏是引自天放先生的再論建立哲民族學的問題一文的。

(註十)見中美日報副刊保壘。

(註十一)引天放先生語句。

# 德國的內幕

穆勒

關於戰後德國的內情，我們知道的實在太少了。納粹統治者在「國內前綫」方面，不是跟在西部前綫一樣的獲勝呢？德國民衆的戰時生活究竟怎樣呢？德國主婦，工人，小店主，中產階級，資本家等，對這戰爭的感覺又怎樣呢？……我們唯一的回答是：不知道。希特勒封鎖新聞的手段，的確是十分高明的。

這裏介紹的，是兩篇絕無僅有的報導德國內情的文章。作者是一個中立的美籍德人，名叫漢斯·穆勒（Hans Mueller），他爲着探索納粹德國戰時的內幕，特地到德國去了一趟。下面就是他偷運出德國邊境，由瑞士寄至美國的兩篇敘述的對象是小資產階級與工人，下篇則爲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自然，這都是他冒性命與自由的危險換得來的。

——譯者

## 上篇（由瑞士瓦西爾發）

目前，在納粹德國裏，反資本家的情緒，跟反戰的情緒一樣的厲害。納粹政權的反對派繼續

存在。雖然戰爭已使地下的工作更加危險，更加困難，但反納粹者還一樣有着巧妙的方法，在德國民衆間進行他們的宣傳。這是我爲着探索真相，在德國巡遊四星期之後，所得的結論。假如德國的郵電檢查沒有扣留牠，那麼，我這報告，將跟國務副卿威爾斯，一同搭着康特·薩伏亞號郵船到美國去。

二月初頭，我從瓦西爾車站轉車到德國。這樣的車站世界只有一個。牠有一部份實施瑞士法律，有一部份是德國的，爲『蓋世太保』（秘密警察）所統治，還有一部份屬於德國，主事的是法軍的『第二部』（*Deuxieme Bureau* 即情報部）和蘇列特人。在瑞士所轄那一部份，你還可以在餐館裏吃一頓熱飯，不過價錢要比戰前貴上一半。如果你越過劃分瑞法兩國境界的障礙物時，你一星期就有三天吃不到肉類。在平常日子裏，每頓只給你一碟。香烟的種類也不多，咖啡有時則喝不到。如果你經過『蓋世太保』所統治的那部份——就如我一樣——當他們驗完你的護照之後，首先就給你一張旅行的購物券。人們告訴我，要是沒有這張券子，你在德國休想買到東西，但後來我發覺，只要肯出高價錢，沒有牠還是可以買到食物的。

接着，火車就沿着『西牆』（指齊格非防綫）駛了一些時候，車窗的帷幕都被放下，使搭客都看不見前綫。旅客們坐着悶不作聲，因爲正如貼在車廂上的標語所說的一樣：『敵人正在傾聽呵！』

你永遠不會曉得，坐在你前面的那個中年商人，究竟把英國人，還是把『蓋世太保』當作偷聽的敵人。同樣，你也不會曉得，傍窗而坐的那個穿得考究，長得漂亮的少女，究竟反對還是贊成戰爭，但當列車繼續前行，大家終於攀談起來的時候，你馬上就會覺得，周圍都談着一個問題，一個使大部份德國人感到苦惱的問題：什麼地方還可以買到必需的物品？這是一個談幾個鐘頭也談不完的話題。因為由瓦西爾到柏林是一段很長的路程，你可以有時間想到資本主義的荒謬。七年前，德國有七百萬失業的人，他們因為無錢，無法買到必需的東西，現在失業差不多已消滅了，但他們仍然買不到東西，這一回是因為東西太少。同時，他們在法國和英國的弟兄們，每天都聽到當局的演說，諄諄告訴他們，說他們吃的太多，最少減少消費，把錢借給政府。

在英法兩國，這種不是失業就是買不到東西的情形，被稱為『民主』，還要工人們去保護牠。在德國，則被稱為『德國社會主義』，並譽之為領袖的永存的業績之一。正如希特勒機關報人民觀察報 (Völkische Beobachter) 所說：『我國消費的單純化，於民衆內部的團結，和階級差別的完全消除，有着極重大的貢獻。』

實際上，這種強迫減低消費的措施，反而加強了階級的差別。當我與柏林，慕尼黑和維也納的工人們談話時，除他們對戰爭的痛恨之外，我覺得最顯著的事實，該是他們反資本家的情緒了。自從第一次歐戰發生之後到現在，德國境內汎濫着反資本家的情緒。這已是第三次。一九一

九年，恐怖和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宣傳，把這波浪阻挫下來，這些領袖們當時在德國境內遍貼着如下的標語——『社會主義在前進中！』『社會主義化即將實現！』第二次強大的怒潮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發生的，當時德國的統治階級抬起希特勒，使舊制度得以繼續。納粹黨利用恐怖和社會煽動，建立了他們的政權。希特勒強迫德國的經濟走上瘋狂擴軍的道路，使他們可以吸收幾百萬失機的工人。在納粹政權創立開頭幾年，德國羣衆反資本主義的情緒，的確漸漸消沉下來，直到一九三七年及其後，方才再度興起，而到了戰爭行將爆發的時候，規模已經十分巨大了。一九三九年八月，魯爾區的納粹報紙，魯爾日報曾向讀者詢問：『我們需要工頭嗎？』牠收到成千成萬的信，給予否定的回答。這些工人信件所表現的憎恨是如此強烈，以致鄂培爾博士們訓令該報，以後千萬不要再提出這類危險的問題。

## 兩個陰影的出現

自從戰事爆發之後，德國境內有二樁事情，差不多完全逃過外國觀察家的注意，然而納粹黨人却把這些看作非常嚴重的事情。第一件是德國工人的英勇的鬥爭。希特勒在剛宣戰的時候，曾頒佈一道法令：工資加抽百分之十五的附加稅，增加工時的額外工資一律取消，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德國勞動者就在共產黨和職工團的領導之下，與這駭人的法令作猛烈的爭鬥。爭鬥一開始就

非常頑強，由一九三九年九月初持續到同年十一月底，終於獲得了重大的勝利。

是在十月初旬（一九三九年）的時候，羣衆的憤怒開始在工廠中大會中爆發了。這些大會是納粹控制的『德國勞工陣綫』（German Labor Front，即總工會）組織的。納粹的演說者時常給如下的高喊阻住：

『額外工時的工資怎樣了？』

『爲什麼你們不叫克虜伯（大軍火商）付錢？』

『越延長工作時間，我們工作越發不起勁！』

在德國的軍火工廠裏，工作的速率已漸漸緩了下來。直到十月底，『勞工陣綫』的領袖來博士，奉希特勒的命令，到各個最重要的工業中心作一番演說旅行完畢之後，他主張撤消前發的法令。著名的一九一九年一月的大罷工的暗影——不妨附帶說一說，這罷工是給魏馬共和國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在厄伯特（Ebert）和諾斯克（Noelke）協助之下，被摧毀的——已在納粹面前幢幢出現。希特勒讓步了。在德國工人的壓迫之下，那可恨的法令終被撤消了。

但另一個暗影又浮起來，那就是一九一六年屠豬事件的重演。

一九一六年，德國農民爲着抗議牲畜食料的缺乏，和農產品的強迫統制，曾殺了幾百萬隻豬。這打擊，使德國食料經濟，從上次大戰起到現在還沒有復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由納粹農

業組織傳出來的消息，德國農民已開始大規模的宰殺牲畜運動，被殺數量要比條例所容許的多得多。這次也是抗議牲畜食料的缺乏和納粹統制團體以低價向農民收買以高價在城市出賣的舉動。納粹農業部長達爾，曾竭力去阻止這一運動，但毫無成效，只有戈林運用其全部權力之後，這屠殺方才停止。在最近一次的廣播中，他答應將以較高的價錢收買牛奶，奶油和其他的產品。戈林這種讓步，一點也不能使他們滿足，而這一次的勝利，業已提高了他們的自信了。

### 納粹的社會煽動

在納粹德國之內，社會煽動又再度高昂了。來博士曾負責此一運動。當我在柏林的時候，他在勞工陣線的機關報攻擊報（Der Angriff）上，提起如下的口號：

『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起來，摧毀英法資本主義！』

當我與許多工人談了之後，我馬上就能够判定這一運動的效果。我可以說，來博士是失敗的。當我和一個西門子（德國最大工廠之一）的工人——他曾參加長期的地下工作——談話時，他對我說：

『當一個工人的老婆肚子痛得難熬，而又得不到一點可燒煮的東西的時候，你焉能叫他相信這就是社會主義呢？』



一個柏林的鐵工人也插嘴說：

『媽的，這叫什麼社會主義！你有了錢，可是沒有可以買的東西。』

在當時流通於柏林的共產黨的傳單中，來博士又得到了如下的答覆：

『好一個「社會主義」！最英勇的爲真正社會主義世界鬥爭的鬥士們，不是就被關進集中營裏。就是牠，把恩斯特·志爾曼（Ernst Thaelmann 德國共產黨領袖）關在牢裏。』

來博士和郭培爾博士的宣傳人員，在大工廠裏時，時常遇到憤怒的詰問和叱責：

『戈林是怎樣胖起來的？』

『沒有牛油，沒有工作！』

『別騙我們，我們曉得你的口糧券是什麼樣的！』

當我離開柏林的那一天，有人把魯爾礦工所發的傳單拿給我看。其中有說：

『他們說的「德國社會主義」，其意思就是販賣死亡的帝國主義商人。世界上只有一國爲社會主義所統治：那國家就是蘇聯，工人與農民把他們的命運，握在他們自己手裏。』

在慕尼黑散發的某張傳單中，也責備納粹黨的頭兒們，利用『所謂德國的社會主義，作爲他們養尊處優，大發橫財的藉口。』

## 反共產黨的恐怖行爲

德國共產黨正在各工廠裏和各戰壕裏，領導反帝國主義大戰，反資本主義煽動及其納粹警大的艱苦鬥爭。我覺得共產黨的勢力日見增大，許多社會民主黨的，和無黨派的工人都傾向於共產黨。『蓋世太保』認清了這一點，所以他們的恐怖行爲，更加緊張。在報上，每星期都登着許多犯罪的消息，有許多人因『在燈火管制時從事犯罪行爲』而被判處死刑。這許多『罪犯』中，好些都是英勇的反納粹政權的戰士，他們利用施行燈火管制的時期，散發傳單，或在牆上塗寫標語。共產黨爲着社會主義的理想，已付出了極大的犧牲。牠的活動份子，至少有三分之二已被暗殺，槍斃，或關在集中營裏。到了一九三八年，共產黨的組織網已遍及全國。這組織網會因動員和戰爭而受了打擊，但在幾個月內，他們又重新建立了起來。

共產黨勢力之所以日見擴大，理由很多。第一，共產黨是唯一不與納粹合作，不與資本家妥協的政黨。第二，自戰爭爆發，共產黨在秘密討論，在傳單標語等各方面，都說明戰爭的帝國主義的性質，並督促德國民衆起來反對牠。『既非希特勒，也非張伯倫，只有德國民衆才能決定他們自身的命運！』許多不知名的和看不見的工人，在工廠的牆壁上塗着標語，在工人的衣服裏放進傳單，有時甚至放在他們的坐椅上，那傳單這樣說：

「這戰爭不是我們的戰爭。爲什麼德國民衆要爲納粹的頭兒們，爲資本主義戰爭製造者的利潤而受苦，而死亡？德國帝國主義在這戰爭中的罪惡，跟法英兩帝國主義完全一樣。德國人，法國人和英國人都反對這一戰爭，也只有他們才能阻止牠！德國的工人們，盡你的職責吧！」

這些宣傳的種子已結了果實，德國民衆早就害怕希特勒會把他們驅上戰場，但仍然希望着，這戰爭多少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去年九月戰事終於發作的時候，德國民衆都十分震驚，國內既沒有慶祝，沒有巡行，也沒有熱烈的示威。每個入伍的人都懷着一顆沉重的心，好像——一個德國商人會這樣告訴我——他們是在參加出殯一樣。

共產黨威信所以提高的第三個理由，就是：當希特勒爲了害怕蘇聯的實力，而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時候，他已被迫洩露了，至少是一部份的蘇聯的實際情況。他——宣傳人員，竭力以蘇聯民衆的幸福歸功於蘇聯地域的廣大與資源的豐富。但共產黨却說明這是由於蘇聯的經濟與蘇維埃的政策。例如維也納的一張傳單這樣寫道：

「希特勒過去告訴你們說，蘇聯的民衆都在挨餓。現在納粹的頭兒們却說到蘇聯的富裕。這樣，你自己就可以明白，希特勒是在說謊。現在希特勒又告訴你們說，他爲着生存空間（Lebensraum）與德國社會主義而進行戰爭。這次也是謊語。這戰爭不是爲着窮人，而

是爲着富人發動的。你們的生存空間已給希特勒奪去了。你們只有學習蘇聯工農的模樣，你們才能獲得可以快樂生活的生存空間。」

在德國民衆眼中，另一個有利於共產黨的因素，是張伯倫與達拉第的叛變，德國的民衆曉得，幫助西班牙，幫助中國，和願意在捷克的生死關頭幫助貝尼士政府的，乃是蘇聯。同樣，他們也曉得，出賣西班牙，出賣捷克，和在遠東跟希特勒不相上下地討好日本的，乃是張伯倫與達拉第。德國反納粹者提到張伯倫時那種輕蔑態度，簡直是難以形容的。一個在柏林市政府任事的社會民主黨員，曾和我大談張伯倫的叛變：

「當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們希望這一回英法大概多少總會幫助波蘭了。但當波蘭前線傳來消息，說自戰事爆發後，英法飛機從未送至波蘭的時候，當我們看到英法絲毫沒有幫助不幸的波蘭的企圖時，我們大失所望了。我相信，任何人，如果把他的命運繫於張伯倫，那牠一準倒霉。我不明白，我那些留在倫敦和巴黎的朋友們，怎能使他們自己相信與英法的同盟呢？」

這公務人員的談話，的確觸着了希特勒仇人們的痛處。德國社會民主黨，天主教派和自由民主派的逃亡的領袖們，且下都擁護着英法政府，都爲他們吹牛，而這些政府却又非正式地，但又越來越發坦白地，說到擊碎和分解德國的必要呢。

## 海外的德奸

我在柏林，曾和一個被納粹殺害的社會民主黨員的寡妻，談了一次話。我們一同坐在她那間陰暗而冰冷的房間裏，提起日子的不好過，她一說就是幾個鐘頭。（在牆頭掛着她丈夫的一幅遺像。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一個可愛的傍晚，他被捕了。一星期後，他那裝在袋裏的屍體，由水中浮了上來。）她最大的苦惱，是沒有足用的牛乳來餵她的孫兒。

『英國怎能向小孩宣戰呢？（這裏大概是指的經濟封鎖）』牠說。『我們在倫敦的那些同志們，怎能跟他們聯合呢！』

當我和反納粹的人們談話時，不斷聽到了這一問話。他們有些人已開始漸漸接近共產黨的黨員，有的則已掉進失望的深淵裏。

不管逃亡在海外的政治領袖們的意見如何，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仍然擁有一大部份過去的黨員，在我看來，他們的勢力已迅速衰落，雖然社會民主黨的觀念，在許多德國工人中還相當強固。我聽到說，前時的社會黨員，現在還是見面喝啤酒，但政治的事，已經絕口不談。他們之中的活動份子都希望共產黨的領導。

無論如何，就總的說來，戰爭在政治上已使勞工運動趨於活躍。自從第一次勝利之後——那

壓迫希特勒撤消其戰時法令——工人們已感到，反抗納粹獨裁者的鬥爭，決非是絕望的。這樣的感情現在已日見強烈了。和我談過話的共產黨員，都證實如下這一事實！他們在羣衆中的影響一天大過一天，許多年來不願接受他們的宣傳品的人，現在都閱讀他們的傳單，許多過去是活動的反納粹份子，近年業已退出政治活動的人，現在也都回來，此外，承認這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人，也日見增多，自然，他們都沒有什麼幻想，他們討論的主題之一，就是究竟希特勒是否將發動那大吹大播的春季進攻。在我離開德國之前，大家都說，食物的問題非常嚴重，一個老的職工團的團員告訴我說：『我們可吃的東西實在太少，但還不是少到迫得人們造反的地步。希特勒曉得，食物的問題的嚴重和前線重大的犧牲，將使他的處境日見困難，所以我以為他將竭力避免戰爭，或避免拖長戰爭。』同時，他微笑地結束道：『我們暫時只有向他進行神經戰一法。』

## 人民的神經戰爭

德國反納粹者所進行的反希特勒的鬥爭，的確是一種神經戰。反戰的傳單，牆壁的標語，工人們對大會上納粹演講員的冰冷的沉默憤怒的叫喊，以及德國民衆對戰爭的態度——所有這些，使納粹組織的神經非常緊張。希特勒時常企圖打破這死寂的包圍，但沒有成功。納粹的一個軍事

作家會把外國的宣傳，稱爲『對德國靈魂的轟炸』，希特勒所担心的，就是德國的靈魂是否是不怕轟炸的。就事實而言，協約國的宣傳，似乎不能動搖德國的人心。我在德國見到的許多事實，都證明德國大部份的民衆，根本不相信張伯倫的『爲民主的戰爭』。但同時，德國民衆神經之不怕納粹宣傳的轟炸，簡直超過外國觀察家的想像。德國正嫉恨這個戰爭——同樣也嫉恨資本主義。千萬小的，但又是結實的共產黨的組織，正頑強地爲消滅戰爭與資本主義而苦鬥着。他們之間，衆寡懸殊，我上面已經說過，他們對他們的任務絲毫沒有幻想。但他們相信他們的前途比以前許多年要好得多。

希特勒能够加强其反德國勞工的恐怖活動，但他決不能戰勝牠。這是我調查所得的結果。在另一篇文章裏，我將討論德國統治階級和中等階級對這戰爭的態度。

## 下篇

(由瑞士瓦西爾發)

弗勞·西爾茲一天得化三個至四個鐘頭去弄到三磅肉，十二盎斯奶油，三隻雞蛋，和幾盎斯的乾酪，薄牛乳（提去乳精的牛乳）和別的消費品。上面這些，是三個人一星期的口糧。弗勞·西爾茲的丈夫是柏林某大機關裏的書記員。他們的女兒厄爾絲是一個速記員。

下面是赫爾·西爾茲（弗勞的丈夫）的故事

他今年五十二歲，上次大戰時曾經入伍，在兩次帝國主義戰爭中間，也就是說，在二十一年間，他有七年完全失業。——即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接着他的一個朋友，衝鋒隊裏一個指揮官，給他弄到目下這個職位。西爾茲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但他終在一九三七年加入納粹黨，這不外是對其職位的報答而已。

西爾茲的家庭是這樣生活的，赫爾·西爾茲每月攢三百二十個馬克，厄爾絲——他的女兒——攢一百十個馬克。政府自動地從其僱員的薪水，扣了百分之二十九，（包括所得稅，戰稅，保險和別的幾種稅）。他女兒的薪水，只扣去百分之十六。因此他們兩個每月所付捐稅爲一百十六個馬克。

但是，不僅此也。『冬季救濟費』的徵收員，每月都來敲他的門，要他百分之二的薪水，作爲『自願』的捐款。說了許多好話之後，終拿出五個馬克打發走他。其次，一個『黑衫隊』員——納粹和『蓋世太保』的耳目，負責監視西爾茲這一家的——每月也來徵收兩個馬克，據他說，這是拿去救濟一個年老而殘廢的老幹部的。但他們屋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曉得這是給他自己花的。每一家都交給他，畢竟，他是『蓋世太保』的眼線。接着衝鋒隊部，那個使西爾茲獲得現下職位的人，每月也收他五個馬克。因此，會給弗勞·西爾茲每月用作吃喝穿着以至房金的，只有二百九十二馬克。但這不是他們主要的煩惱。使弗勞·西爾茲苦惱的，是每月月底，她還剩下五



十個馬克無法花，許多必需品有錢買不到。

### 戰時的口糧

還有，購買食物時要費去了多大的功夫呵！每天早上，弗勞·西爾茲就得擬就當天的戰略。她聽說可以在街角的一家食物店裏，弄到一點鮮魚。她看到一道聲明，說市場上已有一些新的代用品出賣。她又暗地設下埋伏，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新發下來的罐頭蔬菜。但她只有在新鮮食物完了之後，才能買到罐頭。而且必須在店裏當面打開聽頭，藉以避免屯積。然而她還是一樣的屯積，肉店的老板是她家的老相識，因為弗勞·西爾茲二十年來都是他的主顧。有時，她悄悄地溜進那老板的房間，和他老婆談三幾個鐘頭的閒天。她心裏始終記掛着一件事：設法弄到額外的半磅肉或是一些臘腸。要是第三個人——也是懷着弗勞·西爾茲一樣的心事的——在場的話，那麼，他們什麼都談，只有額外的肉一事不提。當第一次口糧券分發之後，弗勞·西爾茲心中想起一個妙計！一清早就起身去領口糧。但她所有的鄰人都一樣想到這一着，因此大家都起得早，等得厭煩，回家之後，又疲乏，又腳酸，又喪氣。

赫爾·西爾茲曾和我談起戰爭：『我們就會獲得勝利，』他說。『我們的元首是奇怪的，牠現在已多少捲起袖口來了。』我懂得這調子。一九三八年納粹吞併了奧地利時，我就聽過這樣的

話。當時人們都說：『這不是很奇怪嗎？他竟能够毫不麻煩地弄到手！』赫爾·西爾茲說的就是這樣的話，而且外表上還現出同樣的自信。他相信英國終將被迫屈膝，但暗地可感到膩煩。

我們也談起猶太人。他自己說他不是反閃族的人。但是，在他看來，猶太人的確幫着包圍德國。猶太人和英國人都不願意德國強大。

他問我有沒有關於蘇聯的消息可以告訴他。當我說有的時候，他便連珠似的提出許多問題來。他的表情既沒有愛也沒有恨。他的措辭很小心，又因為我說話也不好大意，所以只把我想說的十分之一告訴他。我感到在他的態度裏隱着一種強烈的興趣。而從他的話語——『不錯，他們已做了一番重大的事情』中；我也體會到他對蘇聯相當的尊重。

接着他的太太也參加談話，把我們的政治討論公開。她問我別國的人民吃穿如何，是不是真的可以買到他們所欲的一切東西。（在我敘述的時候，她時時發出嫉妬和失望的嘆息。）

西爾茲送我到門口。當他與我握手的時候，他突然非常感動地問我道：

『你真的認爲這戰爭要打得長久嗎？』

『是的。』

他悲惻地直視着我，但這表情馬上就消逝了。

我在德國會見許多中產階級的人。他們中有的相信將獲勝利，有的則不然，有幾個主婦認爲

爲國而犧牲，乃是足以自傲的事情，但大部份的人却完全與這相反。他們之痛恨燈火管制，戰時法規，糧食券和整個戰爭，跟巴黎的杜旁太太和倫敦的史密斯太太一模一樣。雖然，大部份中產階級對納粹政權的態度，表面上沒有什麼改變，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對希特勒及其福星信仰，已不是一種盲目的信託了。他們已再不能沒有懷疑了；他們對希特勒也不是絕對的信仰。七年來的納粹政權，已給予他們一頓教訓。他們曾經答應小店主說，大百貨商店就要關門，然而大百貨商店却照舊鬧漫，反而有四萬家以上的小店被迫關閉，店主們不得不到工廠裏弄口飯吃。過去，的確有一百萬『白領土人』相信納粹的天堂。就是這些人和小店主們，現在，被趕進軍隊裏，因爲納粹怕他們無產階級化。

### 注意集中點——蘇聯

一向相信希特勒會使他們免去戰爭的恐怖的中產階級，特別是那些熱烈地擁護希特勒的人，這戰爭是一個驚人的打擊，不錯，這打擊會因閃電戰的勝利而部份減輕，但其他一部份却仍然存在，且因戰爭的拖長而有更趨緊張的徵象。從他們問你的許多問題中，你就可以覺出這一點。他們有許多人老追問着蘇聯。因此有一個機師就會這樣問我：『你覺得希特勒在他上台的時候，他對蘇聯的情形是不是太過隔閡呢？』另一個也會這樣問：『我不曉得蘇聯以後的行動是怎樣的？』

同時第三個也會提出如下的問題：「你以為斯大林是真正的勝利者嗎？」據說老戰士們——納粹黨員對那些一早就加入納粹黨者的稱呼——對蘇聯還是懷着嫉恨。但在那些與我接觸的人們間，我却看不到他們有焦慮或高興的地方。

我覺得他們對達拉第與張伯倫却很厭惡。有許多人已開始希望「東方」（指蘇聯）出來解決他們目前的局勢。他們覺得目前這局面有點不妙，但又說不出其所以然來。這裏我應當強調如下這一事實：他們已開始注意了，特別是大部份的中產階級更注意得入神。但他們越是不安，就越發被迫去考慮目下所以失望的理由。他們已不相信「西方」能解決這一問題了。

## 和一個大產業家的談話

是在柏林寒冷的二月的一個傍晚，我和德國一個最大的產業托拉斯的經理，一起吃飯。我帶他的介紹信使我和他談話時，裝出非常誠懇的樣子。

晚飯十分簡單。也許太過簡單了一點，我覺得他是有意要我知道他怎樣嚴格地遵守着戰事的法規的。不過酒倒滿好。當我們坐在舒適的客廳裏，喝着代用品的咖啡和白蘭地的時候，他還給我一支非常優美的雪茄。好像他感到慚愧似的，他說：「他們每星期由荷蘭寄給我這麼一盒。這是我唯一的惡癖。」

我們討論着戰爭和政治的形勢，他很抑制，但他告訴我的話都是最富於啓示的，他發言時十分謹慎，每一字句都經過選擇。

「這戰爭，」他開始說，「是英國強迫我們的。你瞧，英國已經越來越老。我們都是年青的人；我們新的營業方法，工業與貿易的新的組織，他們都無法跟上。因此近數年來，英國的工業和貿易都在壓軋我們。最後他們不和我們取得諒解，反而與我們進行戰爭。現在骰子已經擲下了！我們將作戰到底。戰爭將使英國犧牲大部份的生存空間。本來，要是靠別的方法，也許可以便宜一點。」

「但你們的對手，是一個統治了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帝國呵。同時，法國也不是可以小覷的。」我插嘴說。

「法國的陸軍的確很不錯，」他回答，「他們的參謀本部也是如此。但他們都是疲乏的，厭倦的，沒有士氣的；他們不能支持一個長期的戰爭。英國的陸軍不是我們的敵手。」

「但她的艦隊呢？」我問他。「還有他們那日見增多的軍需品的生產呢？」

「不錯，他們有着巨大的艦隊。但你過份估高了艦隊的重要性，潛水艇，水雷，飛機等，已使英國海軍的重要性為之減低。再就軍需的生產而論，我們所生產的飛機，大砲和機關槍，要比英法兩國合計，連他們在美國購買的一起計算，多上兩倍至三倍。是的，也許有一天他們的生產

將超過我們的，不過你以爲我們會吊兒郎當地坐着，和等得那麼長久嗎？」

「但是，原料的問題怎麼樣呢？」

他開始長篇的敘述。從他的說明中，我覺得要我相信納粹所儲藏的原料，要比外界所預料的多得多，同時他們又迅速提高代用品的生產。下面就是他告訴我的一個例子：

「你曉得我們所生產的人造汽油，差不多已滿足了我們一半的需要了嗎？（據專家的估計，德國所生產的人造汽油，只能滿足其四分之一的需要）。此外，在戰事發作之前，我們儲藏的油，已足應付十八個月的需要，而現在我們實際的需要比平時還要少些。（據專家估計，德國的存油，只能夠應付戰時六個月的消費。）」接着，他還作個更重要的補充：「你曉得，當我們感到某種原料缺少，只足幾個月的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會設法去獲得她。當我們感到協約國會切斷我們在歐重要原料的供給時，我們就會先下手。」

### 『美麗的瑕疵』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他承認他對納粹政權的全部特點，不是全都滿意的。他稱呼某些特點爲『美麗的瑕疵』。在他看來，集中營就是這些『美麗的瑕疵』之一，他寧可消除這一類的東西。他尤其痛恨的，是納粹官員們，把他們的鼻子伸進他公司裏的各種商業秘密上來，他做出一副鬼

臉說道：『不過我們還有種種方法和手段，使這些秘密保持秘密。』他對所謂『納粹官員的壞態度』很為憤慨，但他又說：『主要的是元首已把我們這裏弄得井井有條。你是否曉得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國？那真是一榻糊塗。現在呢，你瞧，繁榮，整齊，肅靜。』

『不過，在你自己這公司裏，你是真正的主人嗎？有人說，你實際上沒有發言的權利，並說希特勒已使德國成爲一種「乾枯共產主義」的國家呢！』

『呵，不！元首已把我們從共產主義救出來。有些人不曉得那些我們自願遵守的法規，對一個作戰的國家，是很需要的。德國國社主義在政治和社會秩序等方面給我們的重大利益，足以補償這損失而有餘。元首已把赤黨摧毀了，而且他要永遠摧毀牠。在下次大戰中，一樣也有阻礙我們的生產與輸出的法規。如果我們這一回能有更好和更嚴密的組織，這對德國的工業只有利而無害。勝利將使牠成爲歐洲最強大的工業。』

『但是，提辛（Thyssen，德國最大的工業家，戰後爲希特勒所不容，據說提辛是反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的事情又怎樣呢？』

好像一面石綿的帷幕突然放了下來。

『提辛的事情是特殊的，』他說。關於這問題，我再也無法多聽到他的意見。

## 民氣

我們又談到民氣的問題來。

『我有這樣的感覺，』我說，『他們對戰爭好像越來越厭倦。』

『你說的對，』他回答。『的確有一種厭倦的現象。波蘭的閃電戰已是六個月前的事情。但另一次的成功，不久就會完成而把他們振作起來。元首的行動時常恰當其時地摧毀一切的懷疑與踌躇。』

『是的，』我說，『但是如果真正的戰爭就在目前發動，而損失又極其重大的話呢？你以為這些懷疑和不满會不會凝結成爲某一種的行動呢？』

『真正的戰爭，』他反對我的意見，『我的意思，就是指兩方大軍開始其攻守行動的戰爭，將是極短促的。當民衆發覺千萬人倒臥在光榮的戰場上時，勝利已是我們的了。』

『你是這樣確信勝利的，但戰爭畢竟是一種冒險的勾當。假如勝利沒有到來呢？假如戰爭拖延下去呢？那麼，那時候可能引起的危險局勢，你們又將怎樣應付呢？』

『我們的勝利是不能懷疑的。』他說。『不過，你用不着擔心，我們對每一種可能都會考慮過。一個謹慎的人，手中總留着幾張牌的。』



他所說的話僅止於此。他們手裏究竟是些什麼牌呢？是戈林？還是德國陸軍？我找不出答案來。

### 一個工人的話

我相信這位大工業家決不會這樣確信，假如我和他的某一工廠的一個工人談話時，他能在場的話。這位可靠的，勇敢的反納粹者，正冒着性命的危險，竭力動員廠內的工人，以反對希特勒的政權。他跟我上面所說的許多反納粹者一樣的抱着希望。他對我說：

『民衆們已把恐懼克服了。告訴你一個例子：他們命令工廠的食堂，在某一些天不許供給肉類。我們要求更多的肉。但得不到。是的，我們並沒有罷工，不過當工廠的出產低落下來時，我們便得到肉了。再拿YI廠說。一星期前，有一個反納粹工人，被他們認為騙子，被捕了。其他的工人都放下武器，派一個代表團去見經理，說這個人一向工作很好，什麼壞事情都沒有幹過，如果他不放出來，工人們將停止工作。當天下午，被捕的人終於回來了。

他從袋子裏拿出一張傳單來，叫我唸唸牠：

『全世界的工人應當竭盡他們的力量以擁護蘇聯，因為只有蘇聯是唯一能實現真正和平的國家。蘇聯既不站在希特勒方面，也不站在張伯倫和達拉第方面。』

傳單以如下的要求結束：『提高工資。恢復每天工作八小時，給我們的食糧，和平，自由與麵包！』

那工人接着說：

『去年十一月，在我這一區內，我們已能够分發四百張此類的傳單。最近，在同一區域，我們已可以增至七百張。這就是說，已有七百個人自願冒着最殘酷的刑罰的危險，連被處死在內，以閱讀我們所發的所說的傳單了。就最穩當的估計來說，我們的每一張傳單，至少有二十個以上的人閱讀。』

『蓋世太保』七年來的殘酷的恐怖，並不能阻止德國內部的反納粹宣傳品的流傳。有時，牠的流通數跌了下來；但現在，據我接觸過的許多人所證實，牠確已再度提高。民衆對消息和報告的要求，異常迫切。據說，置有無線電收音機的人，有百分之七十五不管犯罪的危險，收聽國外電台的播音。每天晚上，莫斯科電台的廣播，都爲德國民衆所熱切諦聽，隔天早上，他們還把聽來的，跟工廠那些可靠的朋友們討論哩。

英法無線電台的德語廣播，却不怎樣成功。偷聽這些是要判死刑的。但許多反納粹者告訴我，假如英法的廣播是值得聽的，那麼這刑罰決不會嚇退他們。『然而你冒着性命的危險，去聽那些達拉第今日爲總理延見，內閣舉行會議一類的消息，誰願意呢！』

和我的朋友告別時，我詢問他們，他們以爲這戰爭將繼續多久呢？關於時間的長短，他們沒有回答，只說已準備應付最壞形勢的到來。我離開德國時，有着一個深切的感覺，那就是不管形勢如何，不管戰爭繼續多久，這些人將繼續爲着反納粹政權而鬥爭，而且他們都確信他們一定是勝利的。

## 附錄 一封由斯洛伐克寄出的信

這是一個斯洛伐克農婦寄給她的兄弟（住在美國）的信。她是一個天主教徒，一向與政治活動毫無關係。

親愛的拉哥——劈頭要說的是：我們都活着，牝牛也生小犢了。那些黑白交間的畜牲，已長者高來得頭皮了。信封背面的住址不是我們的，你要曉得，他們檢查一切的信件，把說真話的人都捉了去。

我希望你好，上帝保佑你。我們的生活真難，以後怎樣，只有上帝知道。我們已把所有的麥繳出去了。他們從M——帶着車子來，把牠運了走。一個德國官員給我們一百克隆和一張票子，票子上寫着：我們三月裏再領八百個克隆，其餘的七百個克隆到五月再付，但爺爺說這是撒謊。

如果不是撒謊，那麼就是克隆到那時候已不值錢。什麼東西都賣得要命，親愛的拉哥，我們時常打趣的說，要是你現在還在這兒，而得不到你喜愛的烟草時，你將怎麼辦呢？糖貴得出奇。他們叫他做「白的神秘」。在M——處，他們把十幾個小夥子關進牢裏，因為他們唱着這條歌：

洗澡沒肥皂

餓時束肚皮

若納就是其中的一個。赫林加衛團 (Hinka Guards) 斯洛伐克半法國的團體，為赫林加神父所組織，故名。開頭鞭打他，夜裏，他們中有一個跑到若納面前，問他道：「現在你認得我了嗎？」若納還是一聲不響，那個人告訴他說：「你別把我們不當做人。我們做的，都是應當做的。」其實，他們都是畜牲。你記得S——嗎？他就跟他們一道。聖誕節夜他到R——去捉人。但隔天，他的屍體浮在路左邊的小湖上。

他們把捷克人，猶太人和許多斯洛伐克人趕了出去。現在他們正缺乏有教養的人來做官員。在魯瓊比洛克 (Ruzomberok) 拍拉蒂斯拉亞 (Bratislava) 等處，官廳裏盡是德國人。他們無法跟我們百姓們說話。現在連赫林加的人們都說，我們從捷克人解放了出來，却來了一批德國人騎在我們頸子上。在R——地方農民們把稅關都毀了。

我們接到一道命令，告訴我們應當種些什麼東西，爸爸說我們的收成無論如何，決不會好。我老害怕他說這樣的話，有些人會把他說的話告訴衙門裏的官員的。

你曉得許多由M——地來的人，在波蘭戰爭中被殺了嗎？他們後來解除一部份軍隊的武裝。有三十個關在陸軍監獄裏，因為他們唱一條不許唱的歌。

沙納·馬區到我們村裏來。這是一樁最體面的事。他是一個閹員哩。警察挨家挨戶命令所有男女老幼去出席大會。他告訴我們什麼叫新的斯洛伐克。還說我們應當感謝元首，但大家吱吱喳喳的鬧了一陣，這可叫沙納·馬區動怒了。他叱道：「誰對新國家（指斯洛伐克自治邦）不滿意？」我們接着就喊：「我們都滿意！」但是，回頭沙納·馬區說誰有問題，都可以問他的時候，有人就問：「把本地的外國佬（指德國人）趕走怎樣呢？」「不要限制種植的東西好不好？」「白糖能便宜些嗎？」……沙納·馬區就大談未來，說將來是如何快樂，如何美麗，只要我們耐心等一下，新秩序一定會有很好的成績，但一個農民站起來問道：「用別的方法試試看怎樣呢？」沙納·馬區便問道：「什麼方法？」「現在我們行的是德國方法，還是讓我們試試俄羅斯的方法吧！」許多人接着喊：「對！對！讓我們試一試俄羅斯在波蘭的辦法吧！」這叫沙納·馬區動火了，他大聲的叫：「不能，這樣我們就亡了！」一個老頭兒就說：「那還是讓牠亡吧，我們這就亡掉一場大病哩！」沙納·馬區氣得發紫，把大會結束了，並把那老頭兒扣留下來。但隔天，他

們還是放了他，因為他已經八十三歲了。我們都喜歡這老頭，你曉得，他就是T——的爺爺。他說他還要多活幾年，那時候，俄羅斯人就是爬過那座山來，這樣什麼都公平，就像聖經所說的一樣，窮人高昇，富人吃罪。現在有許多人盡望着世界的高山，等着他們的到來。當我聽到這些話的時候，我就想起了你。

瑪琳娜

又，他們已捉了K——和G——。他們說兩個都在散發俄羅斯報紙。叔叔烏左羅德告訴我們說，維柯文那村（Verkhovina）派出三十一個代表到邊境去，請求俄羅斯人過來。他對我們說，維柯文那村所有的人都相信俄羅斯人不久就會過來的。

（譯者附註）上文及附錄由英國新羣衆四月十六至二十三兩期譯出文內所有加括號的註解，都是譯者加上的。

求知文叢  
第一輯目錄

# 戀愛新論

- 一、戀愛新論
- 二、錢裏乾坤
- 三、日本的新黨運動
- 四、也談關於章太炎
- 五、超然先生列傳（長篇連載）

萬言長論：正確，生動，具權威之見解。  
萬言散文：通俗，新鮮，趣味，立論犀利。  
萬言長論：說詳盡，材料新穎豐富。

發刺，有趣，諷刺，寫實力作。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售 光明書店

十日出版一冊  
實售每冊國幣三角半

## 關於魯迅的事情

華生

魯迅留學歸國後，回到故鄉是在不久就將光復以前。他回到故鄉時作一個中學校的監學兼博物學教員。但後來不做了，準備當編譯去。適有一個書局招他去譯德文，他願意去的，因為翻譯東西本來有點歡喜的，而且他還計劃進書局後還可以出些什麼書。但不久書局又給他信，說武漢已起義，戰事恐怕要擴大，叫他暫緩去。乘這閒暇，他給越社編社刊。越社是紹興一個不很大的社，裏面是大都是反對滿清政權的文人，和南社略有關係。魯迅不是裏面的社員我不知道，但第一期社刊的確是他編的，——包括些詩，文，游記等。後來也不再出下去。這以後不久，杭州也發動了，革命軍佔領了杭州。紹興的舊官吏聞風避開了，漸漸陷於無政府狀態。初尙鎮定，後來人民漸漸恐怖起來。恐怖的是什麼，許多人沒有明確知道。有些人只想含糊的想像，杭州旗營本來有駐軍，雖然打敗了，但會不會奔到無準備的紹興來圖最後的爭扎呢？這憑空的猜想是恐怖的一部分來源。於是有人主張趕緊電告杭州革命軍派兵來，兵隊一到，人心就會安定下來的。結果贊成的人多起來，發了電報。可是回電來的很遲，不過終於得到消息，說兵隊不久當到來，領隊的是王金發。這當然是很歡迎的。王曾在秋瑾姑娘被捕的大通學校當過拳術教師的，說起來大

家都曉得，自然更歡迎。白旗到處飄着。其實，光復誰會反對？這一舉也是多餘的。過了幾天，王金發的軍隊到來後，恐怖已去，人心安定下來了。王請魯迅去接辦一個師範學校。學監是范愛農，即曾經深惡而痛疾之到「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將范愛農除去」的他，但這時候已了解他先前反對魯迅的原因，現在是「受着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自容，」感情就好好起來了。後來范的死，使魯迅很悲痛。

魯迅去接辦師校時，檢點了校具之類，會計員錢雨岩捧出賬簿交出了少數的一點餘款，等候魯迅接收。魯迅對錢的說，「那麼你拿去好了，」這使錢雨岩愕然，問，「拿去交給誰呢？」魯迅給他說明，賬目仍然請他管下去。後來許多年以後，錢雨岩還在高聲的講：「諾，我和樹人先生並不相識，也並無交情，但是他叫我把賬管下去，諾，承蒙他這麼相信我。」校長的會計員必須是私人是已成了不成文的法律的，不更換了會計員這件事，在錢雨岩看來的確是破天荒，他覺得對於他很榮譽的。這時候往來的青年朋友有宋紫佩，李霞卿，王鐸，中郁，治青等。郁不久便去世了，李北大畢業，後亦病故，王後來疏遠了，與宋一直到最後還是有來往。

王金發初到紹興時，本想做一個較好的新官吏，但不久，左右不得人，漸漸傳出壞消息來了。魯迅等就在報上加以攻擊，不久漸漸為王所忌。魯迅以後就辭去了校長，往教育部去了，孫德卿沒有離開報館，結果被王的衛兵刺傷了腿部。但比於後來有些軍閥的所為，還算不橫行。



教育部從南京遷移到北京後，魯迅就住在山會館（後來改稱紹興會館）裏。那裏的房子構造的式子相當好，常分作好些院子，有圓洞門的牆分開。每一院，常常上方三間，旁邊二間，較小，庭中總種些樹，普通棗樹或槐樹。魯迅住的也是這樣的一個院子。中間的一間上方有一塊匾，好像有「補樹書屋」四個字。上方有一條書桌，一頂方桌，但已有些破舊。魯迅住在走進去靠左手的一間。靠窗是一頂紫紅漆的大桌子。桌子左方是書架，右方有茶几和扁方檯。窗照例是一種大格子的和合窗，庭中有一株頗大的樹。地方很幽靜。因為有樹室內不很亮，秋天的陽光照在窗紙上時，也有點蒼涼氣象。魯迅每天上午坐車往教育部。中上通常在一家飯館中吃飯，吃完後，夥計拿摺來，魯迅登上飯錢的數目，交還夥計，送交掌櫃。每月一結。下午仍然坐了車回寓的。幾乎每日都是這樣。魯迅沒有交際和應酬的事情，除非有時候傍晚回寓時往琉璃廠等處轉一下，看看有沒有可買的書或碑帖。但有時候有朋友到他的寓所去談天，時間常常在晚上，常去的大概是許明伯，宋紫佩，許季尚，齊壽山等。客來時，一個男傭人跟着進來便從一個架上取下白磁而有藍邊的杯子，放些茶葉，沖上開水。因為一個煤球爐常常生着火，放在門外邊，有水壺煮着開水。魯迅喜歡吃些雜食，有時買些糖果，栗子，水果等來吃。有時候，吃晚飯的時候，有舊書店的夥計到他的會館裏，拿點書或碑帖去，問他要不要。晚上沒有客來時，有一個時期總是抄碑帖，或看些舊書。

魯迅嗜好極少，除却自南京學礦時學起吸紙烟，此外別無嗜好，在紹興時遇范愛農來時喝點酒（因范愛農喝酒），此外不大喝，在會館時不喝的，影戲也不看，除非有一時期，同人往大柵欄

等處看過幾次，這是極少的事情。那時候已有賈波林（即卓別麟）的滑稽短片，長片常常是偵探案，有時連續好多次，幾個月。

魯迅經過許多年的北平生活以後，終於離開北方到南方，隨後住在上海了。不久，和創造社發生大論戰，從文學理論起，年老，封建，以至於奧夫赫變（後來譯為揚棄）等，都爭論到。他編奔流的時候，一面譯蘇聯文藝政策，一面會看關於辯證法及歷史唯物論的書籍，而且看了不少。但他的文章還是和從前一樣，從不搬弄過一些名辭。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種不搬名辭是無意的，一部分也許是有意的。從他的斷片的談話裏可以知道一點點，他不搬弄名辭的道理。魯迅認辯證是極精密的「學問」，如果不是優秀的（或者還可以加上職業的三字）的改革家，應用起來錯誤的可能是有的。魯迅相信祇要後來能够改好了，錯誤本來也沒有什麼大要緊——不錯誤自然更好。但讀者却會由你的是不是表示辯證法行家的牌子之下作不同的看法的，如果自己不说內行，即使有些說錯了，讀者會當你個人說錯了話的看法，關係就較小，如果自命為辯證法專家在說話，讀者便用另一副眼光看待了，如果再說錯時關係便大了。這意見我以為很確很確的。從這一點看，魯迅的不運用這類名辭，主要的原因是在愛護辯證法。因了別人不適當的亂用術語有些反感，想起來也有一點點關係。也正因了這等原因，魯迅說話時常常當作個人的意見來說，不是扮作代表了什麼理論來說話的，因此別人又常常誤解，對於魯迅的有些論爭，認為是一個人的發脾氣，我們也有得聽到說，「魯迅又發脾氣了」。

以上的意思，從零零碎碎的話裏，抽出來，又貫串起來的而成的，不曉得有沒有把他曲解的地方？

# 超然先生列傳

方生

## 第二回 發爲超然理論

超然先生從但書公學得了『但書』之道，但他並不擺出『但書』面孔，他要努力裝作和但書公無關。我們知道：但書公是未出仕途的，但是先生的兒子。但是先生的臉相，那是遠近馳名，天下無雙，再也和善沒有了的。若待作書的細細描寫起來：那是——

臉圓若洋人皮球，分不出顴高眼低；頸胖如汲水圓桶，看不清下巴界線；淡淡眉毛左右展，八字鬚子兩下低；穿一梳塌領頭藍大褂，戴一頂平頂結西瓜皮；談論時，鬚子一摸，展開了蘭花之手；咳嗽時，鬚子一伸，扇動了垂肩之耳；一生但是無功過，半部論語壓枕底。這是完全的中國本位文化。

而我們的但書公譚司長老爺呢，那就不同了。他是——

臉若猴子帶笑，身輕如燕欲飛。兩肩靈活常掀動，對上司鞠躬如儀：一根脊梁直豎起，見屬下威武無比。不穿西裝隨流俗，漫談風月作消遣。以前是，善說天氣哈哈，而今也，愛談革命嘻嘻。臉紅臉白隨風轉，聲高聲低因人異。若要他靈魂出賣，還得把但書遮面。

這就顯得和但是老爺有點不同了，而是本位文化的半段西化。至於是我們的超然先生，那是對於這些，完全表示深惡痛絕的。他愛穿西裝，愛着皮鞋；還愛帶上一條打狗棒。若在上海，他也一定愛打回力球。而南京竟無回力球可打，可惡。於是他公餘之暇，或者是星期天，他終揮着根黃色藤條的打狗棒，踏響着花旗鞋店買來的二十四元一雙的尖頭皮鞋，在馬路上踱，或者上玄武湖去看風景。

『不是的，』同僚們諷刺他，『你是去看女人的！』

『笑話，』他一定這樣分辨。『女人也是風景之一呀！看女人能够把她當風景看，那就顯得心地高超而純潔了。你們，哼，笨東西，一點也沒有美感經驗。美感經驗是什麼？我知道你們不懂！美感經驗是首先要保持心理的距離的呀。』

於是超然先生馬上引出朱光潛的一段議論來，而且表示自己的擁護態度。他說：

『這話可不錯呀！比如，一個女子要投入玄武湖裏去，我們如其能保持心理的距離，看她如何投水法？是不是彎過身來，折成個九十度的曲線美，一納頭，倒下水裏去呢？還是，兩腳先下水，如同一條蛇似的沒入水底？照前一種投水法，那是有十分強烈的崇高美的，因為她有犧牲的決心。而照後一種投水法，那是有十分道地的柔和美的，因為她還想別人拉她一把，而我偏不拉她，使她可以完成美的傑作……何況這世界，本身就是美。而美是我們的生命之糧食。而我們要

獲得這生命之糧食，就得保持心理的距離，使我能超然物外，而獲得美感經驗。」

他又成爲一個唯美主義者。他還發揮他的意見：死人是美觀的，殺人也是美觀的，因爲他可以看到生命的掙扎。革命是美觀的，亡國也是美觀的，因爲他可以看到血與淚。而這一切皆與他自己無關，因爲他能保持心理的距離。但人們不理解他的這一套美學；總還譏笑他的修飾和服裝。

「哼，」他有時對東山先生發表感慨。「這些蠢豬，知道些什麼！祇有你呀——唉！我還可以跟你談談。他們討厭我穿西裝，其實中國裝完全是老大氣象，這是亡國的徵兆。西裝不但美觀，而且靈便。一穿西裝，人就頓樣了！有精神。有精神就可以救國呀！中國人願意穿中國裝，那便是自甘老大，自甘滅亡！……」

於是他便馬上得到個結論，中國之亡，亡在穿中國裝。

「而且，」他又說，「服裝要整齊，正是新生活的起點呀！」

於是他又得到一個結論，唯西裝是新生活的標準裝，也唯西裝，可以救國。

「新生活難道會有錯誤嗎？」

我們的東山先生對於超然先生這一番話，本來不很同意，但照他近來的心境說，是也還可以部分同意的。

東山先生，我們已經說過，頗有些名士派頭，少爺脾氣。他有時也不免要同情一下普羅階級的，比如像『如蒼生何』之類的感嘆。據人說，他之來部辦公，那是某監察委員保薦的。也就斷定他和某監察委員是鄉親。『不是的。』他很想叫路透社發一個消息，正式否認一下。但現在暫且自己表明態度。『我如其要投鄉親，是寧可投主席的鄉親的。我們的革命政府，用人應該採人才主義，難道像我——哼！』以下，未便說，東山先生於是以『哼』作結。但我們知道東山先生確是個人才。他在廿五歲時，也曾參加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過，可是革得抱頭鼠竄而走，直走到荒僻之鄉，三十元錢半年做起猴猴王來了。照我們時髦作家的寫法，他是『做呀做的』，過了二年，頗有隱遯的思想了。於是從小學教員，隱遯到大學裏去。而又『唸呀唸的』唸了幾年書，唸出個『九二八』來了。他於是又以『隱於革命』之心，參加了大請願，直撲南京，深入國府，當了首席代表，見過主席和王部長，終於『請呀請的』請出一個願望來了，就在交通部總務司當了一名錄事。夫錄事云者，不列版籍之小京官也。不用銓叙，可拿薪水。位低於科員，而錢多於書記，外加要人津貼，實在名至實歸。然而我們的東山先生却很淡然。他對自己說道：『我還是過隱居的生活呀！隱於市隱於朝是一樣的。我雖有做小京官之實，然而，我無做小京官之心呀，那還不是隱遯生活嗎？古人之隱於官者，蓋亦不乏先例也。』於是他隱遯下來了。他說：

『什麼官不官，狗屁，我不過玩兒玩兒。』

但一論到國事的時候，就很激昂，他認為還得請幾次大願，才能請出一點道理來。

「我呢，確實灰心了。竟把我放到這種地方來。但總有一天我會到渭水去釣魚，到南陽去耕田的。」

他彷彿看出釣魚和耕田，是比請願更有效力，因為總有一天，中國的聖明天子，在下詔求賢的時候，輕車便馬，到渭水之濱，或南陽小築，說一聲：「東山先生，請呀！……」再起了。然而，時不我予，東山先生還祇做了錄事。

在初來部中的半年之間，東山先生也曾多方思索，藉以表彰自己一下，但這於他隱遯的理想並不衝突的。他在那國府路的住屋裏，就有手書的紙額一條，曰：「入世人抱出世心」。表明自己主張。他所想到表彰的方法，其一是向中央日報上大投其稿，發揮愛國的言論，其二是潛心禪精的研究起三民主義來，寫成了一冊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他在這一冊書裏把哲學上的唯物論，大大地批評一番，又把印度的唯識論，作了一個介紹式的批評，於是引出宋儒的義理之學，上溯到孔子誠明之說，而用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給予以裝點，得到一個結論：「三民主義之哲學，是融古今中外的哲學於一爐，非常之偉大」，實證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便是「畢其功於一役。」……他如是云云的寫上十萬言，於是謀求出版的書店了。

他首先用交通部收發室的印章，給蓋在那寄出的稿子上面，叫人看了，可以猜到那是經部長

老爺審定過的。接着，還寫了一封自我介紹信，說是部裏的參事。於是寄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要求出版。可是商務印書館立刻給退還了，但還附了一封打字機的信：照例稱贊了他一番，而又說「積稿如山」，未能如命。他於是又把這信裏稱贊的話，摘引下來，又用交通部的秘書名義，寫信給中華書局，要求出版。末後還附上些恫嚇的話：例如：「如其不給出版呀，我是要自殺了」之類，但還是退回了，而且勸他珍重生命。他幾回碰壁以後，決計自費出版，叫老婆每天節省開支，譬如，少吃一碗飯之類，從官俸中扣下一部分錢，當作出版費。印成書之後，他就首先送給譚司長過目，請求批評。然而，悲哉！譚司長於誇張他寫得很好好之後，竟沒有下文了。東山終於沒有再起希望。國府文官長，或軍事委員秘書之類的任命，於他是無緣了！這樣他隱於官是隱定了。他就不滿意政府起來：逢人指摘，逢事批評。看口氣：若由他來一手，中國必定得救，而我們的政府，偏不讓他來一手。「嗚呼噫嘻，末可奈何已，東山不起，其如蒼生何也已。」他嘆息了……這就使他的結論得漸漸接近了我們的超然先生了。

「是的，」他說，「中國人，什麼事就都不打起精神來做呀。你是從衣服的外貌上來看，我呢，是從他們的行動上來看。你看，你家譚司長，哼，他算什麼東西？穿着一通寬廓的長衫，裏面却是一條柴瘦的身子，這會有精神嗎？這不同於我，你看！……」他伸出袖子裏的臂膀，鐵實，堅硬。他穿的是中西合璧的服裝：這就是說，西裝褲，皮鞋，而又長衫。「那是學生派頭呀：因



爲我是一個青年。而且我每天早上起來打太極拳，練精神；而我竟不是一個司長。……」

「我呢——我說，」超然先生回答道：「中國呀，百不如人。機械，槍炮，飛機，飲食，起居，辦公，守時間，甚至於咳嗽，吐痰，那一樣像外國人？我們什麼事都落後，什麼事都追不上。這還有什麼希望呢？我看是，再過幾年，我們非搬到東三省去住不可了。那邊，雖然是日本勢力統治下面，但社會秩序都弄得井井有條呀！官僚官，老百姓像老百姓，而且做官的薪水又多。我呢，是到過日本知道日本人治國的本領的！這一個島國呀！可真叫人可愛極了。清靜，幽閒，行起禮來是十足的九十度，恭敬，和氣。噫！……」

「噫」者，討厭之謂也。據我們超然先生的意見，中國是根本上很可討厭的國家。

我們東山先生自然還和超然先生有點不同。中國之可討厭，那是不用說的，而「噫！」的結論之正確，也毋庸置辯。祇是他說日本好呢，那覺得於心不安了。據他的意見：「不是日本好，而是中國太不好了。」

「可不是嗎？」他舉出例子來。「那些沒有用處的壞蛋，都高居要津，而有才能的人，反而抬不起頭來，這樣，中國還會有進步嗎？」

所以，他又同意超然先生說的：「再過幾年，我們非搬到東三省去住不可了」的主張。

「這是名言，而且是議論，可是說起來，又是多麼痛心呀！」東山先生揉起胸來，而且皺着

眉頭。

超然先生一聽到這贊美。覺得自己應該更顯出一點超然派頭，在他以爲：凡有意見，有人附和，就顯庸俗，庸俗着，君子之所不爲也，還得超然。他把那藤條手杖，往左肘膀子上一掛，從衣袋裏拿出克來文香烟，插在嘴上，輕輕開動打火機，拍的一響，火花如蛇舌吐出，湊近嘴邊，燃起了紙烟，吐出烟來了。那拿打火機的右手，向空一揮，蛇舌收進去了，他彷彿像投彈似的，給這投在西裝的上角衣袋上。但又從那袋口抓出花色的綢手帕，抹一下嘴，照舊摺成三角，給插瓶花似的插歸原處。然後一揚腦袋，把梳得精光滑澤的，那頭頂上給風吹下來，不多不少僅僅祇有一根的黑髮，甩上腦門上去；再由右手從嘴角拔下紙烟，彈一彈灰，然後說道：

『哼！老施，』我們的東山先生姓施，作者非常抱歉，沒有事先交代明白，幸虧超然先生給叫出來了。他叫着抖一抖唇嘴，『像現在這樣的中日糾紛，我是一席之間，就可以給解決的。你想：中國是弱國，日本是強國。這是三歲童子也承認的，可還用說嗎？中國不管怎樣革命，沒有進步，就是共產黨來，也弄不好，這是一定的。那也不用說了。而日本呢，明治皇帝，一講維新，就維新了。蒸蒸日上，成爲世界五大強國之一。這是瞎子不用算的命！那麼，我們就要承認事實，也要承認自己的命運。這是天理，天理是可以挽回的嗎？李頓調查團沒有用，宋哲元的大刀隊，祇好殺雞去。政府如其叫我做全權大使去，那我就毫不客氣：承認滿洲國，簽下字來。你

應該知道，日本近來進佔華北，那是爲的我們沒有承認滿洲國呀，我們承認了滿洲國，他們就沒有道理侵佔華北了。我們不能做阿Q，以爲我們不承認滿洲國，滿洲國就是我們的了。萬事總得看事實呀！而一些自鳴爲愛國之士，那些救國會派，這是得統統給關起來，叫他們少說幾句才行的。他們這麼叫鬧鬧，示威，游行，有烏用呢？喊口號，上請願書，能打退日本人，那是千古未有的奇談。老實一點，承認，就是啦！山海關以外是他們的，山海關以內是我們的，不就行了嗎？中國土地又這麼大，失了東四省，不過牛背上拔根毛。有什麼關係？再說，日本土地實在太小了，英雄無用武之地，怎能不叫他們生氣。正如我們做個小官僚似的，那可多悲苦。我們應該想想別人的苦痛，然後就會忘掉自己的苦痛呀！何況我們去了這一點點土地，是並不痛苦的。……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超然先生於是吸了一口烟，噴了出來，下着結論道：『治國家事，固然須要看作是自國的事，但也得保持心理的距離，看作是別國的事一樣，來下判斷；而辦外交的時候，也須把別國的苦衷想一個周到，再以心理的距離法，下一個判斷，那就很能得到公平與正直了。那些救國會派，簡直是胡鬧，而且熱昏，非把他們關起來不可的。我是主張把中國事不當中國事來辦，才能救國的。醫生開刀是不能把病者當作人看待的呀！』

東山先生對他這些超然言論，並不表示反對。但有兩點，東山先生認爲應該修改的。第一點，他認爲多難興邦，日本打進東四省，再侵佔到華北，那是造成我們多難的機會，是中國可以

興盛起來的朕兆，而且日本越侵佔得厲害，越顯出政府當局的乏，這是他們不肯下詔求賢應得之罪。而自己也不免有一日可以不用隱於官了。第二點，他認為救國會派那種吵吵鬧鬧，游行，示威，請願，這是非常之應該的。這且不說東山先生自己是以請願而入仕途的，實在他們這種舉動，也是代洩了他心中一腔不平之氣；正是求之不得。

『無論怎樣，』他說，『叫這些昏庸老朽，知道些中國人民的厲害是應該的。中國人民要好官吏，他們可都不肯讓出位子來呀！一定要他們吃一點苦頭才行。一定！一定！』

東山先生竟而揮起拳頭來了。他甚至於想到如果這些昏庸老朽們再不悔改，他祇有盼望共產黨來統治中國了。『共產黨一定愛人才，能重用我。』他想着。『我是同情人民的呀！』他又說了出來。

超然先生一發完了議論，也就全多忘却自己是怎麼說的，對於東山先生的議論，實在還沒有聽入耳去。雖然自己議論的聲音，還在他在耳膜裏嗡嗡發響，蚊子似的。但他覺得很討厭，『是誰在發議論呀，大可不必！』他心理想。他對於自己的議論，抱這樣超然態度，自認是非常應該的。照他特有的說法，『我不是個主觀論者，我是個客觀主義者。而惟能客觀，也能超然。』這一起然，是使他滿身感到輕鬆的。他很有彈性的抖了兩下腿子，甩起打狗棒，打着口哨，說上一聲：『沙揚娜拉』，離開了東山先生的人境廬。

照例又上譚司長府上去。

譚司長這回很和善的招待了他。他把打狗棒往衣掛上一鉤，一屁股坐在譚司長對面的沙發上。

譚司長臉上，顯然表示着一種要求。

「華先生，」譚司長說：「現在中國的事，你是明白的，有許多地方，政府祇好保持沉默，不能出來說話。但是文化人是應該代替政府說些話的呀！我們之間，有沒有出名一點的文化人呢？」

「施東山是頗有點文名呢。他常在中央日報寫文章咧。」

「哦！真的！」譚司長吃驚了：「就是那位搗亂份子嗎？」譚司長說：「這倒有點看他不出。」

「正是囉！他還寫過一冊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哪！日本文化人頗推崇這書。這是有事實爲證的。我呢，以前在東京時候，也頗和他們朝野有些往來。因爲我早看出，中國的第一個敵手是日本，所以事先活動活動。」

「那麼，這事拜托你了。」譚司長說着，交給超然先生一帙報紙，那上面載有××給中國文化人的信。他又附着超然先生的耳朵，說明政府的政策。「人民陣線派善於宣傳，政府決定以宣

傳對宣傳，大大發動文化人一下。但是你不能說出去的，說是政府在策動文化人爲不抵抗政策辯護呀！」

超然先在接過報紙，從衣架上拿下打狗棒，就動身告辭。又說了聲：「沙揚挪拉」！來叩訪施東山先生的人境廬了。

「老施，你看，我又回來了。」他叫着，進了東山先生的書房而兼客廳的小屋子裏。「我的確忘不了國事，我想，我們是應該發表主張的時候了。」他說着，坐下在書桌的旁邊。

「可是誰來聽我們的話呢，還是讓救國會派開下去吧。」東山先生說。

「我們要叫中國人民聽我們的話，要叫日本人，要叫全世界人聽我們的話！」超然先生決然的說。「自然，我們的立場，應該是站在人類的立場上，這就會顯得沒有成見了。這人類的立場，不同於國民的立場，也不同政府的立場，更不是階級立場。人類立場，是超然派，超階級超國族的立場，我想以這一立場，寫一封信給日本某著作家去，我要提出二點意見，第一，過去的事全都算了，可是以後還請日本放棄武力侵略。我要說，中國人是愛王道不愛霸道的。爲日本設想，應該對中國採取以德服人的方法，征服中國人的心，別再用以力服人了。第二點，我要在這信裏證明中國人今天並不想收回東四省。中國要跟日本打仗，自然還得再等過一百年。但在這一百年中，日本如能採取以德服人的政策，那就能化干戈爲玉帛，中日兩民族共存共榮了。……你

看，我這樣的態度要得要不得呢？」

「這話呢，本來也沒有什麼不對。」東山先生說，「不過，你說了這話，政府有什麼好處給你呢！沒有好處，話還不是等於白說？還是讓日本人打進來吧！總有一天會用到我們的。」

「我以為你呢，」超然先生沒理會東山先生的意見。把左足交架在右膝上，搖着，超超然。「也應該寫一篇文章。連題目我也給你想好了。那就是友乎敵乎？對日本人說，你們到底歡迎我們做敵人，還是做朋友？做敵人，總不免兩敗俱傷，而朋友呢，那就可以同舟共濟了，自然，以你寫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那樣的文章，一定能寫得委婉動聽；可是千萬不可有意氣之辭，要客觀，要取第三者的態度和口氣。這在文藝心理學上說，「藝術要擺脫一切，然後纔能獲得一切。」而政治，也就是藝術呀！」

「可是，看你這口氣，你是有作用的。」東山先生碎碎然有動於隱者之心了。「是不是政府要我們這麼做，預備重用我們呢？比如，將來你做一個駐日大使，我做一個國府文官長？」

「嗯！」超然先生表示不屑的神氣。「寫文章是一件事，重用又是一件事，那是不能連起來說的。一連起來，那就會使我們文章失却價值，會使我們的好位子也沒有威風了。這正如說，做人爲了吃飯，那人生還有價值嗎？而吃飯爲要做下去，那吃飯還有味道嗎？我們一定要把吃飯和做人分了開來，吃飯管吃飯，做人管做人。吃飯時，一定要使自己並不感到吃飯的需要，不過

就止這麼吃吃而已，那麼，你可以叫自己鑒賞自己咀嚼的聲音，那真是一組好音樂，雖貝多汶的月光曲，無以過之。這才懂得吃飯藝術呀！做人呢，也一定要把自己不當做人似的來做；那麼，你開步出去，你才能鑒賞這步子的輕快和韻律。你一定要如鑒賞一個女人的步子似的，來鑒賞自己的步子。不幸而給石頭絆倒，跌出血來了，你也許會感到一陣痛，但你不能接受這痛，痛是痛在額角上，於你無關，你應該抹下這血來，聞一聞它的香味，鑒賞它的生命的美麗……所以，我們要超然物外，便得把什麼事，件件都分開來看的。那就能外悲哀而却痛苦！天翻地覆都於我無關，但於我有益了。這用處可不大嗎？」

總之是，這以後，東山先生的敵乎友乎，和我們超然先生的給日本某學者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出來了。至於當時的議論，雖然紛紜。但超然先生覺得這是於他無關的。第一，本來那封信是昨日之我寫的，而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了。第二，那些紛紜的議論，是對那封信而發的；而「信」之非超然先生自己，蓋亦明矣。第三，雖然那些議論中，也直接攻擊到超然先生，但攻擊的話是寫在紙上的，沒有給塗在他的臉上，不損他的毫髮，而所謂「超然先生」云云，也不過指一個人的名詞，這名詞「超然先生」不同於具有圓臚方趾的實物「超然先生」，又是不待置辯的。而何況第四……

『第四，誰又有空跟他們開筆戰呀！』



我們的超然先生還是於公餘之暇提打狗棒，行大街上，如涉曠野廢墟，自中無物云云。

東山先生可有點急壞了，幾次跟超然先生索取那文章的代價。

「我說過了呀！」超然先生回答道，「寫文章是一件事，重用又是一件事。你說，我這打狗棒在我手上，它要過代價嗎，但他自有價值，不在我手上，也會在別人手上，他生定有它的威風。價值各自有，但不能代替。——」

這使東山先生很生氣了。

有事話長，無事話短。超然先生這麼地飄飄然活着，過了一年半載。按照超然先生說法，中國歷史，它自己製造出一件大事來了。那便是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超然先生起初對於這事變，並不感到興趣。他說：

「這也有什麼驚恐的必要呀！蒙難的是委員長，不是我們自己；也不是咱們政府和國家。個人的安危，是個人的安危，於我們沒有關係的；於政府國家也沒有關係，委員長總有人當的呀！」

接着，他彷彿覺得委員長這一把交椅，對於他也有四萬萬五千萬分之一的希望，這希望雖然非常渺茫，但也不失為一種希望。於是他有主張了，他在辦公廳上公開宣佈：

「我們要緊的是國法，不是個人。個人可以犧牲的，國法却是不可壞的。我們應該向軍政部

長建議，我們應該派出飛機去轟炸！我們一定要把西安看作不是我們的土地那樣的去轟炸！轟炸個鴨蛋精光，那國法就可以保存下來了。這因為照心理的距離法來說：能够把委員長不放在心裏，才能救得委員長。國法存在了，委員長的精神也就存在了。」

據當時政府大員的意見，以為超然先生的議論精闢之至，應被採擇；然而竟不被採擇者，又是遭了人民反對也。反對之後，而張少帥竟親自送委員長出險。……凡百這些有關國家大事，自有國史館奉命記錄，在下恕不多言。但我們的超然先生覺得這又很有理由可說了。他說：

「轟炸是一件事，而出險又是一件事。轟炸是對事不對人，出險是爲人不爲事。但無轟炸之擬議，則無出險之可能，而竟有出險之可能者，轟炸之擬議有以致之也。」

我們的政府大員見了委員長時，據說大致也如是云云的表示了自己的苦衷。這叫做——  
超然道理總相通，

自南自北自西東，

吃足耳光陪笑臉，

還嫌打得不夠紅。

不知抗戰起來以後，超然先生所作何事，且待下回分解。

---

# 德國的內幕

求知文叢第二輯

著者 穆 勒 等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售 光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296號

經售 各大書店

定價每冊國幣四角半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54  
A 67244

\$0.45